

目 录

第一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3
一、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7
1. 社会革命的概念	7
2. 演进与革命	10
3. 古代和中世纪的革命	17
4. 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革命	21
5. 阶级矛盾的缓和	27
6. 民主	48
7. 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	59
二、社会革命后的日子	74
1. 任务的限度	74
2. 剥削者的被剥夺	77
3. 没收还是赎买?	83
4. 吸收工人参加劳动	86
5. 提高生产	94
6. 再生产过程的组织	100
7.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105
8. 精神生产	110
9. 无产阶级统治的心理前提	120

第一版序言

本书的问世，应归功于**阿姆斯特丹社会主义读书会**的建议。这个主要由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团体曾邀请我在阿姆斯特丹和**德夫特**两地演讲。我提出的几个讲题中就包括有“社会革命”这个题目。因为这两个城市的同志一致同意了题目，而我又愿意讲重复的内容，所以就把它分为两个内容完全不同、但在思路上却彼此连贯的报告：“改良和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日子”。

嗣后，读书会希望把这两个报告予以发表。对此，我当然毫无异议。但是为了便于广泛传播，我宁可把它交给德国党的出版社来出版；有关的荷兰同志们对此也欣然同意了。

这里发表的并不是报告的原始记录。在写讲稿时我曾写下的有些论点，在作报告时为了避免发言过于冗长而略去了。但本书并未超出原来要讲的范围，也没有因为有所增添而成为巨著。

本书的目的可从书的本身看出来，在此毋需详加阐明。当然，对荷兰读者来讲，本书还有一个特殊目的是针对着下述情况的，那就是在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我做报告之前不久，前任大臣**皮尔逊**曾在公开的大会上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由于其内在原因而失败的断言，并对此进行了辩解。我的这两次报告就是对他的答复。这位大臣先生还如此友好地前来听取了我的第二个报告，并在会上勤勤恳恳地作了笔记，但可惜他并未发言反对我。

但是，我之所以提出社会革命作为我两次报告题目，除了因

为它既带普遍性又有地方性的宣传方面的理由之外，也由于我的听众主要是研究学术的。在我们中间，学术界人士毕竟最赞同革命思想——至少在德国如此。但在荷兰，情况却有些不同。荷兰听众的情绪使我颇感欣慰，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两次报告并未遇到任何反对，只得到赞同。我希望，这并非完全出于国际礼节上的客气。在荷兰学术界，毕竟有不少非常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我最大的希望莫过于：我的报告能在德国同志中间获得象荷兰同志那样的赞同。在这里再一次对友好接待我的荷兰同志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这是我乐于履行的义务。

卡·考茨基

1902年6月2日于柏林—弗里登瑙

第二版序言

我写本书到现在才四年，但在这四年中却发生了许许多多历史事件，其中主要是俄国的革命。我党在群众罢工问题上观点的改变，最显著地说明了这个短短的期间内情况和观念变化的程度。在本书第一版中，我讲到我的个人见解时，只把这种罢工说成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有效武器，而当时大多数同志还认为这种武器是“荒谬绝伦”的。在今天，我们党内却相反地认为，前一种见解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看法上空前迅速的改变，绝不可能是由单纯逻辑上的论证来促成的，而永远只能是由无法抵挡的事实必然发展所促成的。

尽管1902年以来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在重新通读本书时却发现，恰恰就在我所论述的领域内并没有什么须作重大修改之处；我当时所预期会发生的某些事情已不再需要说成是大概会发生的了，因为从那以后，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譬如，除了出现上述对群众罢工的承认之外，还出现了日俄战争及其一系列后果。此外，由于发生了俄国革命，我不得不作较大的补充，来阐述俄国和西欧革命之间起点与终点的区别。

仅仅在下述两个问题上，必须放弃我1902年的观点。

我今天已不能象当时那样很有把握地宣称，在未来的革命中武装起义和街垒战争已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反之，莫斯科巷战的经验太雄辩了。在莫斯科，为数区区的起义者曾在街垒战中抵

挡住整个一支大军，坚持达一星期以上，如果不是其他城市革命运动失利使莫斯科驻军获得大量的增援，从而集中庞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起义者的话，他们就获得全胜了。当然街垒战只有具备了如下的两个因素才能相应地成功，即一方面城市居民给了革命者切实有效的支援，另一方面军队也毫无斗志可言。但是谁能很有把握地断言，这种情况不可能在西欧发生呢？俄国士兵不过是一些盲目服从的射击机器罢了；他们盲从的程度简直可以与克普尼克^①英雄们的工具相比。但是，他们在大战失败以后又在对本国人民作战中疲于奔命了这么多年，以致连这点儿盲从性也最终被彻底摧毁了。

我要做的第二个改正是关于英国工人的。我在第一版里所叙述的英国工人在政治上麻木迟钝和软弱无力的情况，在这个新版本里不再作为今日还普遍存在的现象来阐述，而是作为一种正在逐渐消失的现象来介绍了。除了俄国革命之外，独立的英国工人政党的出现，乃是最近几年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最鼓舞人心的征兆之一，说明我们向前发展得多么快。现在，英国自由派还有相当强大的堡垒，但是不久也会陷入穷途末路，并且必然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向无产阶级投降，要么向反动势力求援。这后一种选择虽然能使自由派的地位保持得稍久一些，可是一旦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暴力夺取了英国的政权，他们就必然会大难临头。我在第一版里所指出的英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从那以后已获得了显著的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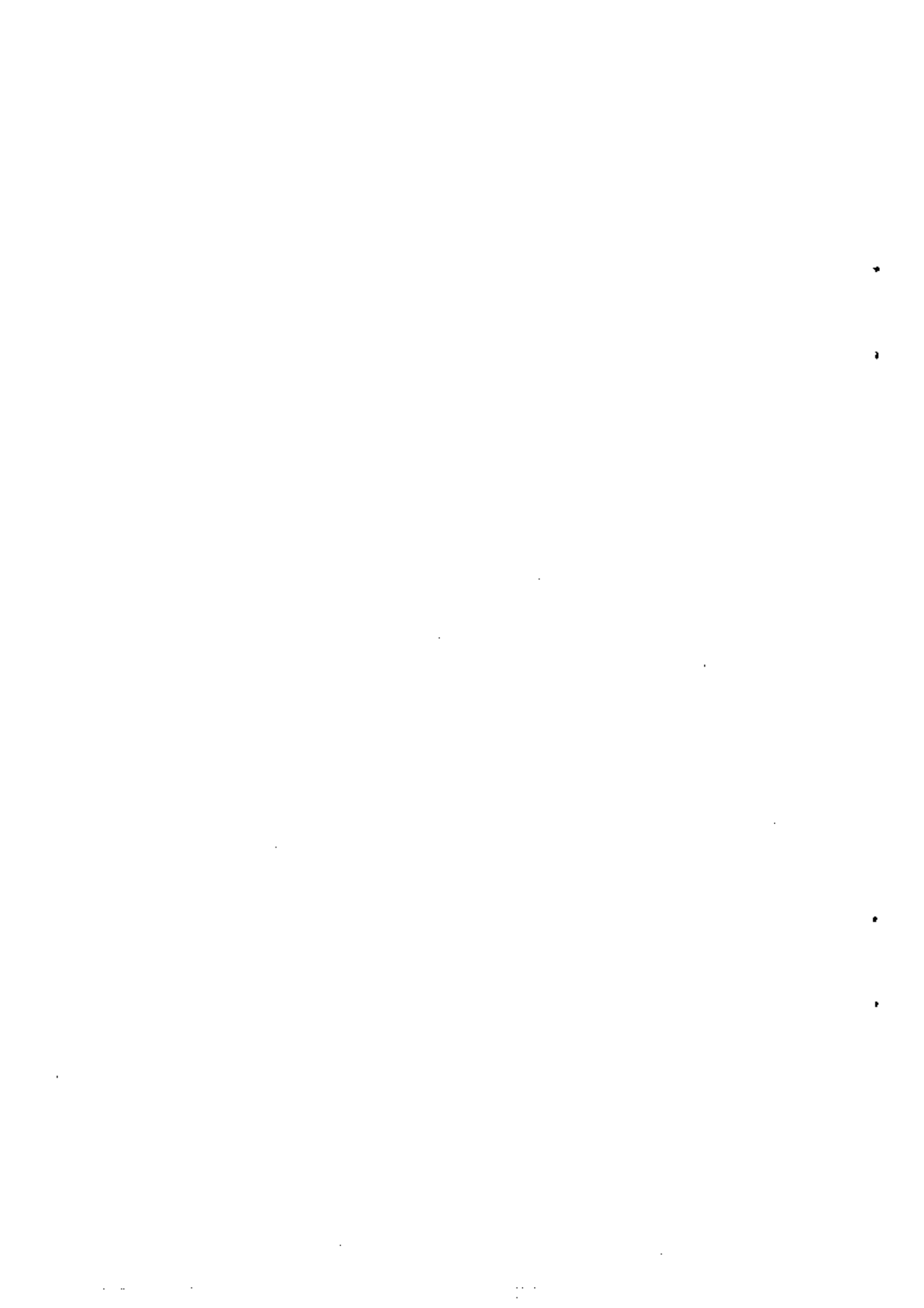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我要做的改正绝不是违背了、或者仅仅削弱了我已

^① 柏林市内一个区的名称，为1888—1918年在位的德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设置的兵营所在地。“克普尼克英雄们的工具”指普鲁士官兵而言。——译者

经阐述的诸原则。在我看来，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局势的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些原则比以前更中肯、更有充分的根据。

卡·考茨基

1906年10月于柏林—弗里登堡



一、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1. 社会革命的概念

在社会革命的概念上发生纷纭的争执是不多见的。这种情况有一部分是由于：任何概念都不象社会革命的概念那样与现存的利益和偏见完全背道而驰；还有一部分是由于：象社会革命那样含义多样化的概念本来是为数不多的。

事态过程通常不能象有些事物(尤其是非社会过程)那样可以鲜明地划定一个界限，而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社会愈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愈多种多样，事态过程就愈加错综复杂。在最为错综复杂的事态过程中就包括有社会革命这种人与人之间传统的协作形式发生彻底改变的过程。

人人都使用着社会革命这个词，却各有其不同的含义，而且使用的时期不同，含义也有所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有些人把它理解为街垒战、焚毁宫室、断头台、九月屠杀之类可以想象得出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综合。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词并不那么锋芒毕露，把它看成是社会的无形之中进行的一种巨大的和平变革，就跟发现美洲或发明蒸汽机所引起的变革相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各种各样持中立态度的看法。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社会的整个庞大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称为社会革命，并认为

它是由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引起的。

如果我们坚持这一定义，那末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社会革命的概念与“经济基础的变化”区别开来，从而认定后者是由蒸汽机或发现美洲之类引起的，它是革命的原因，而不是革命本身。

但是我不想停留于社会革命的这一定义上，而认为也可以作较狭义的理解，即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任何变革并不都是一场广义上的革命，而只是一种狭义上的特殊形式或特殊方法的变革。

任何社会主义者都力求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但毕竟还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革命，只想用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正因为有人用社会改良来对抗社会革命，因而出现了今天我们队伍中争论着的矛盾。我在这里只想就狭义的社会革命，即作为特殊方法的社会变革加以论述。

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后者使用暴力，而前者不使用暴力。各种法律措施和政治措施都是靠国家权力来实现的暴力措施。特殊的使用暴力的形式，比如巷战或处决，也并不构成不同于改良的革命的主要内容。它们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不一定同革命有联系，也可能在改良运动中加以使用。第三等级的代表于1789年7月17日组成法国国民议会就是一次没有任何显著暴力行为的出色的革命行动。与此相反，在同一个法国，1774年和1775年为了制止面包涨价这个唯一的、绝非革命的目的而爆发了要求面包定价的大暴动。

但是，指出巷战和处决是革命的特征，也就是指明了我们可以从中探讨革命实质的出发点。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大革命，已成为一切革命的典范型式，只要谈起革命，就会首先想到它。它是最能供我们用来研究革命的实质和革命与改良之差异的。在这次革

命前，曾试图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改良)，其中最著名的是图哥^①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的目标在许多方面与后来革命所实现的基本相同。那末，图哥的改革又在哪一点上不同于相应的革命措施呢？那就在于后者是由新兴的阶级夺取了政权而实现的。这也就是革命与改革(改良)之间的主要区别。力求使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这样的措施就是改革。如果这样的措施是由迄今一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治着社会的诸阶级来实行的，即使这些措施不是出于统治阶级自愿，而是在被统治阶级威逼下迫于情势而实行的，那么它们就是改良。反之，如果这样的措施是由一个迄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直受压迫而现在已夺得政权的阶级(这个阶级本着自身的利益，必须利用夺取的权力来或快或慢地彻底变革全部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并且建立起社会合作的新形式)来实行的，那末这样的措施就是革命的产物。

因此，不同于社会改革(改良)的狭义的社会革命，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是由一个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革命。谁在原则上否认政治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手段并力图使变革局限于实现统治阶级所允许的措施，那他就是社会改良派，不管他的社会理想与现存的社会形式何等背道而驰。反之，任何力求由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政权的人都是革命派，即使他想用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取来的改革去准备并加速夺取政权，也仍然没有失去革命派的性质。社会改良派之所以不同于社会革命派，其区别不在于争取社会改革的努力如何，而在于直言不讳地宣布他局限于社会改良。从另一方面来说，政治革命如果要称得上社会

^① 图哥(Robert Turgot, 1727—1781)法国男爵，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1758年曾发表《经济表》)的学生。1774—1776年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企图实行几项改革以挽救财政危机，因受特权阶级反对而失败。——译者

革命的话，只有由这样一个迄今一直在社会上受压迫的阶级来进行，这个阶级不得不通过社会解放来完成其政治解放，因为它迄今的社会地位是与它在政治上要居的统治地位相去甚远而且互相矛盾的。诸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纷争，即便可能采取内战这种最残酷的暴力形式，仍不是社会革命。

下面只论述这里已阐明的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2. 演进与革命

社会改良很可能同统治阶级的利益颇为一致，并且肯定会让统治阶级在社会上的权力地位暂时不受触犯，甚至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得到加强。反之，社会革命则一开始就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毫不调和，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要消灭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总要辱骂和谴责革命。统治阶级一旦认为其地位受到威胁，还要用社会改良的思想来对抗社会革命的思想。他们往往把社会改革吹嘘得上了天，却总是不安心把这些改革在地球上的人间付诸实现。

为了反对革命，可以从各个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方式中找出各种论据。当基督教义还在人们的思想中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人们就把革命谴责为罪孽深重地反抗了上帝所委任的统治者。他们可以从新约全书中为此找出足够的证据。因为新约全书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产生的，那时对当权的统治者进行的任何反抗都毫无成功的希望，一切独立的政治生活已全被禁止。革命阶级当然就从旧约全书中找出证据来回答他们，因为旧约全书中曾经保留了很多原始的农民民主精神。

神学的思想方法终于被法学的思想方法替代之后，有人给革命下了一个定义：用暴力来破坏现存的法律制度。但是，既然任何

人都无权违反法律,那末革命权就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似乎革命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法的了。但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却用他们所力求实行的法律,作为永恒的理性法和自然法,也就是以不可转让的人权来对抗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一切现存的法律。这样一来,重新争取人权(人权显然只能因违法而丧失)就简直不可能是一种违法行动,即使人权是通过革命而获得的。

神学的词句今日已不再起作用了,在革命的人民阶层中间尤其不起作用。有关历史上的法律的援引,也丧失了效力。由革命产生的今日的法律和政府毕竟还是为时不久的事物,以至有人不承认其合法性。不但法国的政府,就连意大利的、西班牙的、保加利亚的、英国的、比利时的、荷兰的王朝也都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萨克森这三邦的国王,巴登和黑森这两邦的大公爵,不仅在保持爵位称号方面,而且在获得大片领地方面,都要归功于革命的暴发户拿破仑的保护。霍亨索伦王室是在一些王座的废墟上建立其现在地位的,甚至哈布斯堡王室都要向匈牙利革命屈服。1852年被判以模拟象处绞刑的叛国犯安德拉西^①,不是于1867年成了奥皇的大臣而又不背叛1848年匈牙利民族革命的思想么。

资产阶级曾亲自积极地参加过反对历史上的法律的历次突破,因此在它一旦成了统治阶级之后,就不再能以法律的名义来谴责革命,尽管它千方百计地要使资产阶级的法律在哲学上找到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互相一致的依据。资产阶级不得不寻找谴责革命的更有效的论据,他们在新的、与资产阶级一同兴起的自然科学的思想中找到了这种论据。例如,认为自然界是以突然的大跃进方

^① 安德拉西(Julius Andrassy, 1823—1890)匈牙利伯爵,1848—1849年曾参加匈牙利争取摆脱奥地利统治的独立运动,1867—1871年任匈牙利首相,1871—1879年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1879年与俾士麦结成德奥同盟。——译者

式向前发展的所谓灾难改造论^①，在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情况下，就总能在自然科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居主导地位。当资产阶级不再革命时，灾难改造论就被另一种认为发展是产生于不知不觉的点滴积累的观点所代替，即把发展看成是由竞争中无数极微小的进步和适应积聚而成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按其本性来说是容易接受灾变思想的，而保守的资产阶级则认为灾变思想缺乏理性和不自然。

当然不能武断地说，自然科学家的每个新理论都是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需要所决定的。也有另一种情况，例如灾难改造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恰恰是非常反动，而绝不倾向于革命的。但是，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受着自己所处身于其中的阶级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并且把其中某些思想带到他的科学观点中去。关于达尔文，我们肯定知道，他在自然科学上的假设是颇受汤姆·罗勃特·马尔萨斯这个坚决反对革命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影响的。来伊尔^②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发源于英国，似乎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英国的统治阶级总善于及时摧折革命初露的锋芒，以致英国的历史上二百五十年来只出现过一些革命的萌芽。

一种观点是否正确，当然决不能用它所引起的各阶级对它的喜恶来衡量，但它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后果却要取决于各阶级对它的喜恶。新的发展论之所以很快被广大人民群众欣然接受(他们绝没有可能性去检验它)，那是由于它符合了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它对革命阶层来说之所以十分有价值，就在于它比灾难改造论更

① Katastrophentheorie——灾难改造论，或译灾变论，为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 1769—1832)所创，认为自从地球产生以来，自然灾害曾使生物界经历了十次至十五次改造时期。——译者

② 来伊尔(Sir Charles Lyell, 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有人称他为近代地质学之父。——译者

彻底得多地否定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而没有任何必要承认世界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用造物行为来渐渐造成的；同时，它又把一切革命或一切灾变宣布为不自然，即违反自然规律的，因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从而使资产阶级非常满意。今天，只要用科学来反对革命，就得用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既把自然界说成是没有任何跳跃的，那末要在社会关系中达到任何突然改变也都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通过最微小的变化或改进（在社会中称为社会改良）的积累，才能取得进步。从这个观点来看，革命是不科学的概念；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对它只能耸耸肩头，不屑为之。

对这种观点可以这样来回答：不加区别地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混为一谈，是行不通的。当然，正如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对自然界的观点会不自觉地影响对社会的观点，但这恰恰不是什么有益的事。我们决不应该故意助长这种把一个领域的规律直接移用到另一个领域中去的作法，倒是应该加以制止。诚然，一个领域里的观察方法和认识上的每一进步确实可以并且定会促进另一领域里的方法和认识，但同样确实的是：每一领域总得服从它那不能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独特规律。

应该把无生命的自然界和有生命的自然界严格地区别开。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单凭外表上的相似，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仅仅适用于某一领域的规律移用到其他领域，譬如应用化学上化合物的规律来解决两性生殖和遗传问题。但是，如果把自然界的规律直接应用到社会中去，譬如援引生存斗争的规律来宣布竞争的天然必要性，或从自然界的进化规律推论出社会革命应受谴责，甚或推论出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的，那就会犯同样的错误。

还可以提出进一步的回答：即使自然科学中旧的灾难改造论已一去不复返了，但那种认为只有通过最微小的不可觉察的变化的积聚才能产生进化的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发生了矛盾。它助长了

把进化论简直降低到极端清静无为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倾向，而另一方面客观事实又证明灾变在自然界的发展中获得了更大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仅见诸于来伊尔的地质进化论，而且也见诸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于是出现了一种把旧的灾难改造论同新的进化论二者兼收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里可以找到的那种二者得兼的情况极为相似。就象马克思主义把缓慢的经济发展同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较迅速变革区别开来那样，某些新近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理论除了承认有微小的和极微小的变化的积聚以外，也承认有从积聚的变化中产生出突然的重大变化——灾变。

这方面值得重视的一个事例，就是得甫里斯^①在自然科学研究者汉堡代表大会上所介绍的他的观察。他发现植物和动物的种类虽是长期保持不变的，有些种类如果衰老了而且又不能适应在此期间内发生了变化的生存条件，就会衰亡而灭种，但另一些种类则较为幸运地(照他自己的说法)有所突破，产生了一些新的生存形式，其中有的站住了脚并且繁殖下去；有的不能适应生存条件，也会衰亡而灭种。

我并不打算从这些新的观察中得出对革命有利的结论，否则我也会陷入同那些从进化论中推论出革命应受谴责的人所犯的错误的相同的错误。但上述观察至少证明：自然科学研究者本身对于灾变在地球发展和有机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因此，要从任何一种科学假设里就革命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盲目地推断出结论，就是错误的了。

但是，如果有人尽管如此仍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通俗例子来回答他。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分娩**过程，

^① 得甫里斯(Hugo de Vries, 1848 — 1935)荷兰生物学家，主张突变说，认为新种的发生是由于偶然变异。此说与自然淘汰说相对立。——译者

它显而易见地证明自然界也有跳跃。分娩就是一次跳跃的行动，因为分娩时胎儿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人。胎儿原是母亲机体的一部分，与母体有共同的血液循环，由母体供给营养，而且胎儿也不会呼吸。但是一旦成了独立的人，则有自己的血液循环，能呼吸和叫喊，并能自己取得营养，而且通过肠道来排泄。

但是分娩与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仅仅在于这种过程的跳跃性。如果更仔细加以观察，我们就能发现分娩时的跳跃式变化局限于功能方面。器官原是缓慢地发展着的，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出现那种突然产生新功能的跳跃。如果在达到这个发展程度之前就出现跳跃，那末其结果不是器官新功能的开始，而是一切功能统统终止，新的生机就死亡了。另一方面，器官在母体内的缓慢发育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决不能不通过分娩这一革命行动就直接开始其新功能。器官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分娩的革命行动就一定不可避免。

在人类社会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革命在人类社会中也缓慢的、逐渐发展(演进)的结果。在这里，以缓慢的速度发展着的，也是社会的器官(即机构)，而能够突然一下子发生革命变化的，则是社会的功能。铁路事业的发展就是缓慢的。可是另一方面，可以一下子把一条铁路从一个以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的、使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企业，变成一个以社会主义方式来经营的、专门为公众谋福利的企业。正如在分娩时婴儿的全部功能——血液循环，呼吸，消化——都同时发生革命那样，铁路的全部功能也将在实现上述变革时一下子发生革命，因为这些功能互相都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能把这些功能分阶段地相继实行国有化，譬如今天使司机和司炉的功能实行国有化，几年之后使养路人员的功能实行国有化，再过几年又使出纳和会计人员的功能实行国有化等等。这个道理在铁路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如把铁路的各

种功能分阶段实行社会化那样，把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部的各种功能分阶段实行社会化也是同样荒谬的。一个部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器官（机构）必须协同合作，其一部分机构的功能在其他各机构的功能不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改变的。想由社会民主党逐步掌握某一部的各个部门的想法，其荒诞的程度无异于企图把分娩行动分成相继好几个月的若干分娩行动，其中每一行动都把某一特定的器官从胎儿状态变为独立孩童状态，而仍旧把这个小孩联在母体的脐带上，直到他学会走路和讲话为止。

既然一条铁路或一个部不能逐渐地，而是只能一下子在其所有的机构中都同时把资本主义功能改变为社会主义功能，把它们从资本的机构改变为工人阶级的机构，那末这毕竟只有在社会的全部机构的发展都达到一定的高度时才有可能办到；这时，在社会中当然不能象在生母有机体内那样，科学地确定什么时候达到了必要的成熟程度。

但另一方面，分娩并不意味着人体器官发育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发育时期的开始。孩子这时就进入了形成新器官的过程，同时现有的器官将朝着特殊的方向进一步完善，比如口里长牙，眼睛学看，手学握，腿学走，嘴学说话等等。同样，一场社会革命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结束，而只是新的社会发展的开始。社会革命能一下子把一个工厂从资本家所有转变为社会所有，但是却只能逐步地在缓慢而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使这个工厂由一个单调乏味而令人生厌的强制劳动的场所，变成一个人们乐于积极工作的有吸引力的场所。社会革命也能一下子使现存的农业大企业变成社会财产。至于还盛行着农业小企业的地方，就必须在那里首先建立起社会性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机构，不过只有通过缓慢的发展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看到，分娩与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是相当不少的。但这

只是为了证明我们不应当用自然现象来论证社会革命是不必要、不合理和不自然的事。正如我们前面已谈到的那样，我们无权直接从自然界的事例中得出社会事例的结论。用这样的对比方法不可能走得更远，而只能得出结论说：正如一切动物必须经历一次突变（产仔或啄破蛋壳）来达到其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也只有通过突变才能进入其更高的发展阶段。

3. 古代和中世纪的革命

我们只能从研究社会发展的事实中，而不能从它与自然科学的对比中，得出革命是否必要的结论。为了说明社会革命（即我们这里所采用的狭义的社会革命）并不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回顾一下社会发展的几个较早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早在阶级矛盾和政权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且是非常久远的社会发展阶段。当然，在这个阶段里是不可能由被压迫阶级来夺取政权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社会革命。

即使在阶级矛盾和国家政权已经形成以后，我们无论在古代或在中世纪都还一直看不到任何符合我们所谓社会革命概念的事物。我们看到的是多次激烈的阶级斗争、内战和政治灾难，但是并没有哪一次在所有制方面引起过根本而持久的变革，更没有产生新的社会形式。

其原因我认为是：在古代和中世纪，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重心都在**地方基层**。每个城市乡镇都形成一个在一切主要方面都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并且以松弛的纽带同外界保持着联系。各个大国只是这些市镇的集合体而已，它们若不是由一个王朝，就是由其中一个居于统治和剥削地位的市镇来纠合起来的。每个市镇都有与其自身独特条件相适应的特殊经济发展和相应的特殊阶级斗争。

当时的政治革命主要是地方性的革命，因此通过一次政治革命来变革整个大地区的社会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

社会运动中参加的人数越少，其规模也越小，则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合乎规律的现象也就越少，而偶然现象和个别现象就越占优势。这就必然会使各个地方的阶级斗争更具有复杂的多样性。正是由于这种阶级斗争中没有出现群众运动，由于偶然现象和个别现象在这里掩盖了合乎规律的普遍现象，所以也就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到它的社会原因和阶级目的。希腊人虽然在哲学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他们对科学的国民经济的概念却是陌生的。亚里斯多德只提出了这方面的一些要点；希腊人和罗马人在经济学领域里只是提出了一些有关家庭经济或农业经营方面的实际指南，比如色诺芬^①和瓦罗^②所撰写的书就是如此。

引起各阶级不同状况的深刻得多的社会原因既然不为人所知，而是被个人的作用和个别地方的偶然现象所掩盖着，那就难怪被压迫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也首先要利用其权力来消除个人和个别地方的设施，而不去进一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但妨碍这种革命意向的最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发展的缓慢性。经济的发展是极不显著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按照他们的祖父和曾祖父所习惯的方式劳动着。旧的做法、旧的习惯似乎是唯一完美的地道的做法。即使有人争取采用新的做法，也得竭力使别人相信是要恢复已被遗忘的旧传统。技术的改进并不产生对新的所有制形式的需要，因为它没有使任何新的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而只不过促使现存的生产方式趋于完善，即日益扩大社会劳动分工，把一个行业分成好几个行业罢了。但是在每一个新行业中，都还

^① 色诺芬(Xenophon, 公元前约 430 — 354)希腊学者, 有过关于希腊史及哲学的著作。——译者

^② 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 公元前 116 — 72)罗马学者, 有过关于罗马史, 拉丁语及农业的著作。——译者

象在旧行业中那样用手工操作，谈不上什么生产工具，而手艺技巧依然起着决定的作用。虽然在古代的末期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大企业，甚至也有工业的大企业，但这些企业都是用奴隶来进行生产的，而这些奴隶则是被看作外来人而排斥于地方组织之外的。这些企业只生产奢侈品，因而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力量，只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使农业遭受削弱而奴隶成了更廉价的劳动力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例外的情况。从奴隶经济中是不可能产生较高级的经济形式和新的社会理想的。

在古代和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唯一的资本形式，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二者虽然都能暂时引起迅速的经济变化，但是商业资本只能促使旧行业分裂成更大量的新行业，并且用奴隶劳动来促进大企业的进展；高利贷资本也只能发挥使现有生产形式苟延残喘的作用，而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形式。奴隶们反对高利贷资本和农业大企业的斗争曾导致与当代社会革命相似短暂的斗争，但这种斗争的目的却始终只是恢复以前的状况，而不是社会革新。梭伦^①为雅典农民所实行的债务偿还制度，以及因格拉库斯兄弟^②而得名的罗马农民和无产者运动，就是这种情况。

在有典可查的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某些时期内，除了经济发展缓慢、缺乏对社会关系的较深刻的认识、不少市镇共同体在政治生活上分崩离析这些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即镇压新兴阶级的权力手段是相当微不足道的。当时没有官僚机构，至少在还有活跃的政治生活而且阶级斗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地方，是没有官僚机构的。例如在罗马社会，官僚机构在帝政时代才刚刚发展起来。

① 梭伦(Solon, 公元前 640—560)雅典法学家，曾改革债法。——译者

② 格拉库斯兄弟，即蒂贝里乌斯·格拉库斯(Tiberius Gracchus, 公元前 162—133)和盖乌斯·格拉库斯(Gaius Gracchus, 公元前 153—121)罗马平民，倡导增加自由农民土地的运动。——译者

各个市镇内部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通商往来是简单的，不需要特殊的专门知识就很容易通盘了解的。统治阶级可以从本阶级中遴选管理国家所需的人材，而且在统治之余还能有暇从事艺术、哲学和政治等方面的活动。这就是说，统治阶级不仅行使统治权，还亲手加以治理。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的。就在有典可查的古代鼎盛时期，民兵制度便很流行，每个公民都有自卫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力量对比稍微有一点改变，就足以使一个新阶级上台，因而阶级矛盾决不会尖锐到两方面相持不下的程度，即一方面彻底变革现存制度的思想在被压迫阶级中深深扎根，而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却照样顽固地坚持其种种特权。正如上文所讲的，政治革命大都仅仅以清除个别流弊和更换个别人物为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用妥协的办法来避免发生革命。

在现代大国中，英国就是一个政治形式与中世纪极为类似的国家，只不过在经济上毫无共同之处罢了。在英国，官僚机构和军国主义很不发达，并且至今保存着不仅居于统治地位、而且从事治理的贵族政治。因此，在英国这样一个现代大国中，被压迫阶级的意向也只局限于清除个别弊害，而不是反对整个社会制度；在这个国家中，用妥协来防止革命的做法得到最广泛的运用。

如果说人民普遍具备自卫能力并不会助长大规模社会革命的发生，那末这种情况却容易使各阶级之间一有机会就发生武装对抗。在古代和中世纪，暴动和内战并非罕见。对峙的双方往往怒不可遏地要把战败者加以驱逐或没收其财产，甚至更多地是加以人身消灭。谁要是认为暴力行动就是社会革命的特征的话，他就会在当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内发现有许多这样的革命。但是，谁只承认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夺取了政权从而使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变革才算社会革命，那末他就

在那个时期内看不到社会革命。那时，社会发展是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的，并不汇聚成重大的灾变，而表现为无数点滴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它们彼此并无联系，往往中断一时又重新发生，并且大都是不自觉地进行的。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时代里最大的社会变革——欧洲奴隶制的消灭，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以致当代人对这一过程根本没有予以注意，现在不得不对它作许多推测。

4. 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革命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发展，情况随着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想在这里阐述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动及其后果，那就会扯得太远，而且是重弹老调。只消说说下面几点就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现代国家，使地方或区域的共同体失去了政治上的自主性，同时也削弱了它们在经济上的自主性；每个地方和区域的共同体都成为国家整体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权利和独特的风尚；大家都拉到一个同样的水平，制定同样的法律，缴纳同等的赋税，设立同样的法庭，服从同一个政府。这样一来，现代国家就必然要求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除了各方面的平等之外，还要求语言上的平等。

国家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现在已完全不同于古代或中世纪了。现代国家中任何一桩重大的政治变化都会立即极深刻地影响着广大的社会领域。因此也可以肯定，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的夺取政权，现在必然会引起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

另外，现代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资本主义的技术革命也扩大到武器技术方面。自从宗教改革以来，作战武器越来越完善，但造价也越来越高，因而成了国家政权的专利品。单

单这一点就足以使军队脱离人民而独立存在，即使在盛行征兵制的国家里也是这样，否则就得由全民武装来补充，但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这种情况。无论在哪一国，军队的指挥员都是与人民相脱离的职业军人，他们构成与人民相对立的特权阶级。

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经济上的威力，较之以往的国家也是非常强大的。它集中了广大地区的财富，而这些地区的生产技术手段，使古代最高度的文化都大有逊色。

同时，现代国家还拥有以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拥有过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现代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此之多，以致没有精密的分工和高深的专业知识就不可能胜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夺去了统治阶级从前曾有过的闲暇。他们虽不从事生产，而只靠剥削生产阶级来过活，但毕竟不是悠闲懒散的剥削者。竞争成了推动现代经济生活的动力。剥削者彼此之间为了竞争而无休止地进行竭尽全力的斗争，而竞争的失败者往往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威胁。

因此，资本家既没有时间和宁静，也没有从事艺术和科学活动所必需的基本修养；他们甚至缺乏正式参加政府活动的资格。不仅艺术和科学领域，就连国家行政部门，统治阶级现在已不可能插足其间了。他们把国家行政交给雇员和豢养的官僚们去办。资本家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却不直接治理，只要操纵政府就行了。过去，腐朽的封建贵族阶级也是通过宫廷贵族来这样做的。不过，封建贵族阶级之所以放弃他们的社会职能，是他们腐朽没落的结果，而资本家阶级放弃其职能则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职能有限，即由其本质决定的。

即使一个阶级已成为多余，甚至是社会的赘瘤，它还可以凭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苟延一段长时期。国家权力越强大，统治阶级就越依靠国家权力，越顽固地坚持他们的特权，而不愿意作任何

让步。但是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维持其统治的时间越久，阶级矛盾必然就越尖锐，政治崩溃之势必然就越明显（如果终于会出现崩溃的话），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就一定越深刻，被压迫阶级夺取政权就越容易转入社会革命。

同时，投入战斗的阶级也会越来越意识到其政治斗争的社会后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发展的速度异乎寻常地加快了。机器在工业中的应用，又继续推进了肇始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经济变革。从此以后，我们的经济关系就不断在变化，不仅旧事物迅速瓦解，而且新事物又迅速形成。对旧事物的传统的概念不再相当于经过考验的、值得尊重的、不可触犯的概念，而与不完善的、不充分的、陈旧过时的概念有了相同的含义。这种看法已从经济生活蔓延到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领域中。如果说以前人们对旧事物总是不加检验地迷恋着，那末现在人们却仅仅因其陈旧而不加检验就抛弃它。而且，使一台机器、一项设施、一条理论、一种艺术鉴赏变得陈旧过时所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如果说人们从前是为了创业守成而苦心经营的话，那末现在人们就只图眼前的暂时效果而掉以轻心。因此，今日的产品往往不仅追求时髦，而且很快就不堪使用和过时了。

新事物正是人们最爱观察、评论和仔细探讨的事物，而传统的和日常的事物则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确实，人类对日蚀原因的思索比对日出和日落原因的思索要早得多。只要社会现象是传统的、理所当然或“自然而然”的现象，要研究其规律的急迫性就很小。反之，只要新的、闻所未闻的事物在社会上一出现，研究它的急迫性立刻就会大起来。在十七世纪初，首先引起科学观察的不是陈旧的传统的封建经济，而是在与封建经济并存状态下新近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

经济科学还受到另一个因素的更大的促进，即资本主义生产

是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是大国型。现代经济正如现代政治一样，都必须与**大量现象**打交道。人们观察到的同样现象越多，就越注意到它们的普遍性，用它们来揭示社会的规律，而越不去追究个别性和偶然性，就越容易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对社会现象作数学上的大量观察的统计学，以及从政治经济学发展起来并在唯物史观中达到其高峰的社会科学，只有在生产达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才有可能出现。只有这时候，各个阶级才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了其斗争的社会意义，才第一次为自己提出了伟大的社会目标；这种目标决不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必然破灭的任意梦想和虔诚愿望，而是对经济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深入的科学考察的结果。诚然，这种科学认识也可能发生错误，其某些结论可能证明是幻想。但是，无论其错误有时可能多么大，总抹煞不了真正科学的特征，那就是力求把一切现象统一地归结为一个不会自相矛盾的完整概念。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科学上，要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中的个别部分是不能任意地单独加以改变的。社会上处于被压迫地位的阶级要从理论上加以批判的，已不再是个别的人和个别的设施，而是**整个现存的社会**；至于已经夺得了政权的被压迫阶级，则应当去变革整个社会基础。

从1789年革命及其连带引起的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轮廓，事先就已被重农学派及其英国的追随者设想到了。

根据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与古代和中世纪组织之间的区别，可以看出其发展形式上的如下差异：后者大都是不自觉地、在发展程度高低不等的无数小邦小国之间经常发生局部和个人纷争和叛乱的情况下分裂出来的；而前者则是越来越自觉地在追求一个既定的、并通过大量科学批判工作加以阐明的伟大社会目标中成长起来的。政治革命更稀少了，但更广泛了，其社会后果更巨大了。

从古代和中世纪的內战过渡到上述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这一

过程就是由一半属于中世纪而一半已进入现代的宗教改革来完成的。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就已经是更高级的了；直到法国大革命，终于提供了社会革命的典范型式；至于 1830 年和 1848 年的起义，仅仅是法国大革命微弱的余音而已。

这里所说的社会革命，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以前，是不会有这种社会革命的，因为那时的政治范围还太狭小，社会意识还很不发达。社会革命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作为一切社会阶级中最低的阶级，必然利用它的统治去消除一切阶级统治和全部阶级，从而也将消除任何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使我们今日感受极深，因为它对我们当前的实际行动有极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革命的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了？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政治条件，使得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不经过政治革命，不经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能完成；或者我们仍须期待着一个争夺政权的决战时代，也就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呢？社会革命的思想是否属于已经过时的思想，只有那些不假思索地抱住传统观念人云亦云的人或者哗众取宠博得无知群众热烈鼓掌的投机家才会抱着不放，而一切不带偏见地观察今日社会事实的现代正派人物都一定会加以驳斥的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确实也是一个绝非一两句空话所能搪塞了事的重要问题。

我们已揭示出，社会革命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产生不仅要以高度紧张的阶级矛盾，而且要以一个大的民族国家为其前提，这个国家必须消除一切外省和地方自治政体的特殊法律，并且是在足以对抗任何小邦割据势力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同时还要有一个靠官僚机构和军国主义而强大起来的国家政权，要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以及高速度的经济进展。

在过去几十年里，上述这些社会革命的因素中，没有一个被削弱过，毋宁说其中大多数因素都有所增长。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来没有比这几十年更快过。由于新闻事业的发展，科学的经济学至少在广度上取得了进展，即使不说在深度上取得进展的话。经济学上的见识从来也没有象今日这样广泛地普及，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去估计其行动和意向的遥远后果。这一切就足以表明，我们将不再是不自觉地完成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过渡，我们不可能在剥削阶级已经意识到我们要推翻其统治的情况下慢吞吞地采取行动，因为他们会进行反抗，并且使用其全部权力手段来压制在力量和影响方面正在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

但是，如果说对社会关系的了解从来没有象今日这样普遍，那末国家政权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有力，其军事力量、官僚行政和经济力量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大。由此可以推断，无产阶级如果夺得了政权，就会立即使用这一权力实行广泛的社会变革。但也可以推断，今日的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他们在经济上存在的必要性之后，还能靠这些权力来继续保持其存在，并对劳动人民继续掠夺。但统治阶级越是依赖国家机器，越是滥用它来从事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对他们的愤恨就必然越强烈，阶级仇恨就会越增长，夺取国家机器的劲头就会越强大。

有人曾对此提出异议说，这种对最新的社会现象的理解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情况也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据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不是在加剧，而是在减弱；在每一个现代国家里，都有足够的民主措施，来保证无产阶级即使不取得政权，也能慢慢地逐步取得并迅速扩大其权力。以致

社会革命已不再有必要了。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异议究竟有多少道理。

5. 阶级矛盾的缓和

我们首先来考虑前一种异议：似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正在缓和。我在这里姑且撇开工业危机问题不谈；那是几年前就有人断言其已趋缓和的。从那以后，显而易见的事实已对这一看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以至我在这里不需要对它再作讨论；否则将使我们离题太远。我也不想对那已经使人厌烦的所谓贫困化理论的辩论再补充任何进一步的论述，因为这场辩论只要你愿意的话，是满可以运用一点技巧就把它无穷无尽拖延下去的，而且辩论的劲头与其说是为了确认既成的事实，还不如说是在如何理解“贫困”一词上绕圈子。我们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若不加以限制，就会导致物质贫困的加剧。但是我们同样认为，在今日的社会里，只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足以遏止这种贫困。我们最终认为，无产阶级不能日益消沉下去，而必须日益强大起来，才有希望获得解放。

但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跟贫困化完全是两码事。它根本上是剥削日益加剧的问题。

马克思早在一代人之前就已证明了剥削的确是在日益加剧，而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人反驳过他。谁对无产阶级遭受日益加剧的剥削这一事实提出异议，谁就必须首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提出反驳。

这时，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那纯粹是死板的理论罢了；对我们来说，仿佛只有我们能用手抓住的事物才算是真实的。据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出的不是经济规律，只是一些统计数字。而

精确的统计数字却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因为至今还不曾有人愿意在统计表格中既提出工资数字，也提出利润数字；这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资本家们总是把他们的防火保险箱当作一个堡垒，哪怕他们当中最胆小最和善的人，都会象狮子一样守住这个堡垒，不受当局的任何侵犯。

但是，毕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增长数字。至少在我所知道的一些显然不是有关德国，而看来是有关英国的最近的统计中，就有这么一份。它是由A·L·包莱编制的，并在1895年三月伦敦统计协会上作报告时引用过，后来转载于该协会1895年六月的《公报》第224至285页上。我们从其中摘出下列表格：

年 度	全年工资收入总额		非 工 资 收 入			
	单位：百 万英镑	在国民收 入总额中 所占的 百分比	应交纳所得税者		不交纳所得税者	
			单位：百 万英镑	在国民收 入总额中 所占的 百分比	单位：百 万英镑	在国民收 入总额中 所占的 百分比
1860	392	47	376	45 ¹ / ₃	64	7 ² / ₃
1866	464	45	485	47	81	8
1870	486	44 ¹ / ₂	521	48	85	7 ¹ / ₂
1874	609	45 ¹ / ₄	635	47 ¹ / ₄	100	7 ¹ / ₂
1877	591	43	652	47 ¹ / ₃	130	9 ¹ / ₂
1880	567	42	652	48 ¹ / ₃	126	9 ¹ / ₂
1883	609	42 ² / ₃	696	49	122	8 ¹ / ₃
1886	605	42	715	49 ¹ / ₂	125	8 ¹ / ₂
1891	699	43 ¹ / ₂	782	48 ¹ / ₂	130	8

对这张统计表，可以提出各式各样的意见。在我看来，这个统

计太乐观了，工资数额的增长似乎比实际情况快得多。

在计算工资时，统计人并不考虑到失业情况；除此之外，统计人假定：在他不能确切认定已发生变化的方面，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些重要因素就算照旧未变。不待说，作为统计人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但发生变化的往往恰恰就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因素。譬如，女工和男工的比例，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比例，就是这种因素。

但最成问题的是，这个统计仅仅限于少数几个行业。所有这些行业，除了农业工人之外，都已有了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工会组织。于是统计人便不假思索地一律认为，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已经提高到了与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同等的水平；其实，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即使在英国也至多只占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看看各类工人的工资变动情况，也不无趣味。以 1860 年的工资为 100，其变动情况如下：

	1860	1866	1870	1874	1877	1880	1883	1886	1891
农业工人	100	105	107	130	132	122	117	111	118
建筑工人	100	116	116	126	128	125	125	126	128
棉织业工人	100	125	125	148	148	134	146	155	176
毛织业工人	100	106	112	121	130	126	120	115	115
钢铁工人	100	127	127	143	112	112	110	100	124
机器制造工人	100	108	110	124	123	120	127	126	126
煤气工人	100	115	120	125	128	128	130	130	149
海 员	100	113	103	129	123	102	118	110	143
矿 工	100	?	100	150	115	100	115	100	150
平 均	100	113	113	138	132	124	130	125	140

我们看出，从1860至1891年，工人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包莱对英国整个工人阶级所做的这种统计，甚至不能适用于整个工人贵族。除了棉织业工人之外（棉织业工人不愧是英国的稳健派和一切“社会和平”梦想家的模范儿童），超过1891年工资平均数的只有煤气工人，海员和矿工。煤气工人工资的增加，至少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政治家们的活动，而并非单纯得力于工会的活动，因为有了政治家们的活动才使大城市的市政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对于煤气工人来说，纳入市政以后是简直用不着考虑到私人资本的竞争和剥削的。1891年煤气工人工资的增长，也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新工会主义”的突然出现；“新工会主义”曾令人产生如此过分的希望，以致嗣后不久希望完全落空。1891年海员和矿工的工资增长，比煤气工人的还更显得突如其来，而且是暂时性的。1886年矿工的工资还同1860年的一样，而到1891年则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不能认为这种增长是确有保证的进展。但是，对于建筑工人、毛织业工人和钢铁工人来说，1860年以来的工资增长仍然还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包莱硬要我们相信，在这个期间内，英国整个无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组织良好的钢铁工人的工资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我们不妨就依据这样一张表格。它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即使按照这个十分异乎寻常地乐观的统计，工人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小了。从1860到1874年，工资平均增长额占国民收入的45%；从1877到1891年，它只占42%。如果我们在缺乏更有根据的数字情况下，不妨把应交纳所得税的非工资收入数额算作剩余价值数额，那末这个数额在1860年还比工资总额少三亿三千万马克。但到1891年时，剩余价值数额就已大大超过工资总额，竟不下于十六亿马克。

这毕竟说明了剥削量的相当迅速的增加。依此，在上述期间

内,剩余价值率,亦即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从96%增加到112%。即使根据包莱的数字来看,甚至对组织得最好的工人的剥削,也实际上至少加剧到上述的程度。对于无组织的工人的剥削,势必还要厉害得多。

包莱的统计表只计算到1891年为止。激进的国会议员齐奥查·麦奈在随后的十年里调查所得的数字,补充了包莱的数字。麦奈的数字是记载在他所著《财富和贫穷》一书中的。该书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据第8版第98页所载英国应交纳所得税的收入为:

年 度	收 入 总 额 单位: 百万英镑	土 地 收 入 单位: 百万英镑	工 商 业 收 入 单位: 百万英镑
1893—1894	673.7	206.7	356.6
1894—1895	657.1	208.1	340.6
1895—1896	677.8	210.6	356.6
1896—1897	704.7	214.2	377.1
1897—1898	734.5	216.5	401.3
1898—1899	762.7	223.8	416.5
1899—1900	791.7	228.4	436.2
1900—1901	833.3	232.8	466.2
1901—1902	867.0	238.2	487.7
1902—1903	879.6	241.9	491.6

如果我们把这些收入的消长算作剩余价值的消长,那末在1893到1902这十年里,剩余价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工商业利润甚至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工资的增长则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譬如,伦敦木匠的工资在1894年是每小时9 $\frac{1}{2}$ 便士(75芬尼),在1903年是10 $\frac{1}{2}$ 便士(85芬

尼),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瓦匠的工资在1894年是6½便士(55芬尼),在1903年是7便士(57芬尼),即增加了百分之八。排字工人的工资在1894年是每星期38先令,在1903年是39先令,即增加了百分之三,等等。

齐奥查列出了如下的利润和工资增长对比表(表中把1900年的数字定为100。1893年则表示1893至1894会计年度,其余照此类推。):

年 度	利 润		工 资					总 计
	应 交 纳 所 得 税 的 收 入	工 商 业 收 入	建 筑 工 人	煤 矿 工 人	金 属 工 人	纺 织 工 人	农 业 工 人	
1893	80.91	76.60	90.00	80.44	92.60	94.97	92.08	90.02
1894	78.99	73.17	91.11	76.13	92.56	94.97	91.50	89.25
1895	81.39	76.60	92.22	72.54	93.18	94.97	90.91	88.76
1896	84.63	80.90	93.33	71.90	96.75	94.97	90.91	89.57
1897	88.11	86.05	94.45	72.60	98.18	94.97	92.08	90.46
1898	91.59	89.27	97.78	78.60	99.19	94.97	93.83	92.87
1899	95.07	93.56	98.89	83.53	99.61	98.22	94.99	95.05
19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901	104.08	104.72	100.00	93.95	100.25	100.00	100.70	98.98
1902	105.64	105.58	100.00	87.53	100.25	100.00	100.70	97.70
1903	108.40	107.72	100.00	84.92	99.93	100.00	100.97	97.16
1893— 1903 增加	27.49	31.12	10.00	4.48	7.33	5.03	8.89	7.14

可以看出,齐奥查·麦奈所称为利润的,也包括地租和利息在内,这也就是剩余价值;它们在1893至1903年的十年里,也同

1860至1891年期间一样,增加得比工资快得多。利润和工资之间的矛盾显著地发展着。自那以后,工资的增加越来越陷于停滞状态,而剩余价值的数额则进一步迅速增长。

如果说,从英国的统计中最能看出剩余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对比关系的话,那末美国的统计则提供了有关失业的最广泛的资料。

在美国,失业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因为这些调查数字虽不总是完全可靠的,但我们毕竟能据以进行一番比较。我们从其中算出如下的百分比增长数。

美国的失业情况是:

年 度	失 业 期					
	男		子			
	1至3个月		4至6个月		7至12个月	
	绝对数	百分比	绝对数	百分比	绝对数	百分比
1890	1,553,759	51.6	1,179,426	39.1	279,932	9.3
1900	2,593,136	49.6	2,069,546	39.6	564,790	10.8
增 加	66%		76%		101%	
妇 女						
1890	265,106	51.9	188,992	37.0	56,515	11.1
1900	584,617	47.1	485,379	39.1	171,496	13.8
增 加	120%		156%		203%	

由此可见,在男子和妇女失业者中间,短期失业者的百分比有所下降,至于较长期失业者,则不仅绝对数增加了,相对数(百分比)也增加了。失业一至三个月的男工“仅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与此同时,人口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一,就业人数增加百分之二十四!但是,失业四至六个月者,则从1890至1900年增加了百

分之七十六；失业半年以上者甚至增加到两倍。

妇女失业者的人数增加得还要快：失业一至三个月者增加了120%，失业四至六个月者增加了156%，失业半年以上者则增加到三倍。

根据1901年对24,402个工人家庭的调查，这一年有多达12,154个家长（也就是半数）失业，而且每人平均失业达九个半星期之久！

所有这一切数字都只会坚决支持而不会反对关于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加剧的论断，这一论断是由马克思以其他途径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而得出的，直到今日还没有人驳倒过它。有些人当然会说：应该承认，剥削是加剧了，可是工资毕竟也在增加，即使没有增加得象剩余价值那么快。既然剥削的加剧不会公开暴露出来，而只能通过长期调查显示出来，那末工人究竟能从哪里感觉到剥削的加剧呢？工人群众是既不研究统计资料，也不考虑价值和剩余价值论的。

这可能是对的。但毕竟有一个途径能使工人们感觉到剥削的加剧。随着利润额的提高，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是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并没有一堵不通风的大墙把彼此隔开。上层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久而久之也传染到下层阶级，在下层阶级中间引起新的需要和要求，而增长缓慢的工资是不敷满足这种要求所需的。资产阶级大骂下层阶级不再安分守己，欲望增多，他们忘记了，下层阶级要求的提高仅仅是上层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反映而已，惹起下层阶级欲望的正是他们的榜样。

我们可以确切地看出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比无产阶级的提高得快。五十年以来，工人的住房并没有多大改善；反之，今日资产阶级的住房，比起五十年前资产阶级的住房水平来，则堪称豪华讲究了。今日铁路上的三等客车，与五十年前相比虽有改善，但其内

部设备仍悬殊不大。而十九世纪中叶的头等车厢又怎能与现代化列车上的豪华车厢相比呢！我不相信，远洋轮船上的海员今日的住宿条件会比起五十年前有多大改善，但是现代化客轮头等舱里的奢华富丽，甚至与五十年前的皇家游艇相比，也是堪称闻所未闻的。

此外，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和物价腾涨，工人的状况已经绝对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他们不需理论上的考虑，就能认识到对他们的剥削已加剧到什么程度；种种关于阶级矛盾缓和的夸夸其谈，都是一派胡言乱语。

关于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加剧，就讲到这里。但是，阶级之间在政治上的日益接近，会不会抵销这一经济因素呢？工人会不会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愈来愈被资产阶级承认为同等人呢？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正在迅速赢得政治威信和社会威信。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提高落后于资产阶级，从而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欲望和不满，那末，无产阶级在道义上和思想上迅速而不断的提高，也许是近五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几十年前，无产阶级的处境还如此恶劣，以至连有些社会主义者也预料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对文化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洛贝尔图斯^①在1850年还写道：“目前存在着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会再出现一次新的野蛮人的风暴；这次风暴将来自社会本身的内部，它将把文明和财富之国夷为废墟。”

几乎与此同时，亨里希·海涅宣称，未来属于共产主义者。“我是以忧心忡忡和极度恐惧的口气承认未来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

^① 洛贝尔图斯(Johann Rodbertus-Jagetzow, 1805—1875),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贵族地主思想家, 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
——译者

哎，这决不是故作惊恐！实际上，我一想到那个时代就只有不寒而栗和毛骨悚然。那时，愚昧无知的圣像捣毁者们将取得政权，他们将用胼胝的双手，干出砸碎美人的大理石雕像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大家知道，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威胁着现代文明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正是这些共产主义者，今日已成为艺术和科学最可靠的保护人，他们一贯是最坚决地提倡艺术和科学的。

于是在巴黎公社之后，支配过整个资产阶级的那种恐惧也迅速消失了。在那以前，整个资产阶级都相信，获胜的无产阶级将象民族大迁移时期的汪达尔人那样大肆蹂躏我们的文化，他们将在废墟上建立一个野蛮的苦行派的王国。

正是由于这种恐惧的消失，才使得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强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同情。

同雇用无产阶级一样，也雇用本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我在上面已经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统治阶级既没有兴趣，也没有闲暇能象雅典的贵族或天主教全盛时期的僧侣那样，去关心国家的行政事务或从事文化艺术和科学。他们把那种从前是统治阶级特权的整个高级精神活动，都交给雇用的劳动者去做，因而专职的学者、艺术家、工程师、官吏的人数就迅速增加了。

把他们作为整体来看，就组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一“新的中间等级”；但是，他们由于缺乏任何特殊的阶级意识而与旧日的中间等级不同。他们当中的个别阶层有一种特殊的等级意识，往往还有一种特殊的等级自豪感，但是其各阶层的利益太独特了，以至无法发展成一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他们的成员参加了各个阶级和政党，从而为各阶级和各政党提供了大批精神战士。其中有一部分人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许多知识分子由于职业上的

需要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另外一些人则把无产阶级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但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迄今还一直陷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圈子之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而且也因为他们作为“中间等级”的社会地位是同小资产阶级那种介乎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地位十分相似的缘故。

上文所讲到的那些越来越同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人，显然就是知识分子的这一部分。因为他们没有一定的阶级利益，而且由于其职业活动最容易具备科学的洞察力，所以他们最容易经过科学地考虑以后被我们的政党争取过来。他们必然会认清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破产，并且看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优越性。在这样的认识过程中，他们必然会越来越感觉到，其他阶级总是在竭力进一步贬低艺术和科学的成果。其他许多人士也终于被社会民主党正在不可阻挡地日益发展这一事实所感动，特别是当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与自由主义无法挽救的日益腐朽加以对比之后。因此在知识阶层中普遍产生了对工人的友好态度，以至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沙龙不在大胆地议论着某个或更多的“社会主义者”了。

如果这些知识阶层能够起到与资产阶级同等的重要作用，那末我们当然就能稳操胜券，而任何社会革命都必然是多余的了。因为，同这个阶层讨论问题是容易的；从他们那里也不会遇到对稳定而逐步的发展给与强制性的阻拦。

但是，可惜他们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这样的一部分：他们虽然代表资产阶级**写作和讲话**，但并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行动**。人所共知，对人的评价只能根据其行为，而不能根据其言论，对阶级也必须这样。

同时必须记住，尽管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心正在增长，他们也只是资产阶级中最无战斗力又最缺乏斗志的部分而已。

以前，当社会主义在知识阶层中被斥为犯罪或神经错乱时，资产阶级分子只有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彻底决裂，才能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谁要在当时从资产阶级圈子里冲出来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谁就必须为此有比一个无产者更大得多的毅力、革命热情和坚定信念。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构成了最激进和最革命的一支力量。

今日，社会主义已在上流社会里时髦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想要获得社会主义者的称号，已不再需要任何特殊的毅力，不再需要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新社会主义者不能摆脱其阶级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感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知识分子的斗争方法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不同的。无产阶级要用其人数上的优势及其阶级组织的团结一致来对抗财富和武力。知识分子在人数上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没有任何阶级组织。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用言词和文字来进行劝说，即用“精神武器”和“道义上的优越性”来进行斗争；“沙龙社会主义者”还想用这些武器来决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胜负。他们宣布愿意把他们的道义武器赋予无产阶级，但要在如下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不仅在暴力毫无取胜希望的国家里放弃使用暴力，而且在暴力确有取胜希望的国家里也放弃使用暴力。因此，他们尽力使人不相信革命思想，把革命思想说成是不中用的手段。他们想从革命无产阶级中分出一翼社会改良派，因此力求分裂和削弱无产阶级。

迄今为止，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开始信奉社会主义的唯一效果。

除了“新的中间等级”之外，旧的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还在勉强度日。从前，这个中间等级曾是历次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颇有斗志，善于斗争，在条件有利的地方很容易就会勃然奋起反抗上层的一切奴役和剥削，反对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统治，反对封

建和僧侣的特权。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核心队伍。正如今日一部分“新的中间等级”那样，这个旧的中间等级有时也对无产阶级颇表同情，同无产阶级协力合作，向无产阶级提供和从无产阶级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力量。但是，无论新旧中间等级，都永远是不可靠的盟友，这正是由于它们处于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中间地位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指出过，小资产阶级分子既不完全是无产阶级，也不完全是资产阶级，他们按情况不同而有时觉得自己是资产阶级，有时又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

于是，从这种双重地位中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与无产阶级一致，另一些部分则与无产阶级的敌人一致。

小企业是注定要没落衰亡的，这个过程正在无法阻挡地向前发展。但是这个过程在小企业数目减少上表现得很缓慢，而在小企业衰败上则表现得很迅速。有些小企业所有主已陷入完全依赖资本家的境地，他们简直成了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里为企业主干活的家庭劳动者和雇用劳动者。另一些小企业所有主，特别是小商人和小酒店老板，他们还能独立存在，但是他们的顾客都是工人，因此他们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境况的好坏。这部分人愈来愈与战斗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反之，小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则与上述情况不同。他们还没有陷入完全依赖资本家的境地，但在走向这种境地或走向毁灭；还有一些小业主是不在无产阶级圈子中寻找顾客的。他们不敢相信能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兴旺起来，而指望一切转机来自上面，即来自上层阶级和政府的救助。而且因为一切进步都在威胁着他们，他们就愈来愈反对任何领域里的进步。奴颜卑膝和卖身投靠的习气使他们成为心甘情愿的帮凶，甚至成为君主政体、教会和贵族的狂热维护者。但是，他们同时又依然是民主主义者，因为只有通过民主，他们才能发挥其政治影响，才能获得公众势力的支持。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没落，主要就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极分化。一部分分化出来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另一部分则转向反动的民主派，在其中披着五光十色的外衣，如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民主派——其实都是保守党和中央党的一些小宗派，但它们的社会成份始终是一样的。

反动的民主派的某些观点和论据是从社会主义思想中剽窃来的，因而某些人在开始时认为，它们是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殊过渡形式。今日已很明显，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社会主义最誓不两立的敌人，莫过于这种反动的民主派了。如果说，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文化上的一切进步——无论这种进步是否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末反动的民主派则在其整个本性驱使下，要阻挡一切文化进步，即使这种进步并不直接威胁小业主的利益。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党是最进步的政党，那末反动的民主派就是最倒退的政党，因为他们对进步事业除了有与其他反动政党相同的仇恨之外，还对他们狭隘的思想圈子以外的一切事物极度无知。而且，小资产者只有靠惨无人道地榨压最弱小和最无力反抗的劳动力——妇女和儿童，才能继续保持其剥削者的地位。他们这样做，当然首先会遇到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因为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组织力量和强制性立法来废除这种践踏人类生命的野蛮行为。

这样，那些不倾向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从盟友和置身于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调和分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凶恶的敌人。我们所看到的，不是阶级矛盾的缓和，而是阶级矛盾发生了人们所能设想到的最无法调和的尖锐化，而且正在迅速地达到其顶点，因为这种尖锐化是在几年前才明显暴露出来的。

对小有产者情况的估计，稍加修改也适用于农民。农民也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小农组成的无产者阵营，另一个是资本家性

质的有产者阵营。我们的任务在于加速这种分裂过程，以便我们能够向前者说明他们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而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忽视这一分裂过程，不用阶级观点而对整个农村居民一律看待，那末我们就会妨碍这一分裂过程。农村里的反动的民主派，按其本质是同城里的反动的民主派一样敌视我们的，即使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矛盾。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农民团结只是农民从旧政党(尤其是中央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过渡阶段，其错误就跟那些指望城市里的反犹太主义也会促成这种过渡的人一样。中农和富农则憎恨社会民主党，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争取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成了农业工人流入城市和农民找不到人干活的重要原因。

在农村，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社会矛盾也在日益尖锐化。

大地主和雇工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更甚于农民和雇工之间矛盾的尖锐化。

雇工在农业大企业里，比在一般农民那里起着更重要得多的作用。但是对雇工来说，食品价格的抬高就不象对自己消费其大部分产品的农民那样没有多大影响。食品生产者与食品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当然不象工人与其剥削者之间的那种矛盾，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城市里，无产者今日是人数最多、最有战斗力和最有斗志的阶级，因此，食品出售者在城市里也遭遇到无产者作为其最强有力的敌人。

因而也用不着奇怪，大地主今日对产业工人的看法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从前，他们对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是漠不关心的，在资本家面前往往毫不掩饰其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时甚至对无产者表示某些同情。当时，无产者并不碍他们的事，而资本家则在他们需要自由贸易的地方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另一方面，资本家则认为地租妨碍了利润，并且力图从地主手里把军队和政府中

高级职位的垄断权夺过去。

情况已今非昔比了；保守党和贵族地主——狄士累利^①、洛贝尔图斯、福格芬——对工人友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同小资产阶级和中农富农阶级一样，大地主也愈来愈敌视工人。

但是**资产阶级**呢？它今日是举足轻重的阶级。至少它会象知识分子那样对工人较为友好些吧？

我很遗憾，也看不出这种情况。

当然，资产阶级也在发生变化，它不是永远不变的。但是，什么是它最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呢？

我们看到，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某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们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等企业组合减弱了、有时完全消除了竞争；另一方面，由于新的资本主义大国，尤其是德国和美国的兴起，国际竞争尖锐化了。

企业主联合组织不仅消除了企业主彼此间在面临产品买主时的竞争，而且还消除了他们彼此间在面临工人时的竞争。现在，工人只面临独一无二的劳动力收买者，而不是许多收买者。但是，无论企业主的优越地位因此提高了多少，他们对工人的矛盾因而也就更尖锐化了，这是毋需进一步阐明的。

企业主联合组织一方面限制工资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产品价格。对于最近几年物价的不断飞涨，企业主联合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物价在美国上涨最快，美国的托拉斯制度也最发达。在德国，物价高涨当然主要应归咎于农产品保护关税和地主的垄断。

但是，外国的激烈竞争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物价高涨的结果，既不利于消费者，也不利于工人。除了实行保护关税引起物价

^① 狄士累利(Disraeli, 1804 — 1881)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曾任首相和财政大臣。
——译者

上涨之外(这反过来又有利于成立企业主联合组织),对工人的剥削也加剧了。资本家力图用加剧剥削来对付外国的竞争。因此,他们加紧反对工人建立斗争组织——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因为这样的组织将阻止资本家为所欲为。

由此可见,在这方面,阶级矛盾也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

此外,还要加上第三个因素——工业资本同金融资本、金融巨头的日益结合,工业资本家是在生产(广义上讲,包括运输业)领域里拥有一定企业的企业主,他在其企业中剥削那些被雇用的工资劳动者,并且从他们身上获得利润。反之,金融资本则是旧式高利贷的现代化形式。金融资本家从他们贷给别人的金钱中获得利息收入。在当代,他们不仅象从前那样贷给手头拮据的私人,而且还贷给资本主义企业主、地方当局和国家等等。

在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大矛盾,这种矛盾与工业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相似。贷款的利息也象地租(典价和租金)那样,是要从企业主收益中扣除的。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两种资本的利益就发生了矛盾。现在,大地主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最好是君主政体的国家政权(因为只要他们本人是宫廷贵族,就能影响君主,从而操纵国家政权),同时还热中于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将给他们的子孙在军官生涯中打开晋升之途,而资产阶级的子孙则不配当军官),并且永远赞成对内和对外实行横暴政策。而金融巨头也正如大地主一样,非常赞成政府实行军国主义,并且对内和对外实行强有力的横暴政策。金融资本的上层人物不必畏惧这种强有力的、不听命于人民和议会的国家政权,因为他们作为债权人,并且通过个人在宫廷里的影响,就能支配这种政权。而他们既作为债权人,又作为国家的供货人,在军国主义化、战争和国债上也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们的影响和剥削的范围,以及他们的权力和他们的财产,都会由于参与上述几方面的活动而增长起来。

工业资本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军国主义化、战争和国债都意味着提高税收，而税收的绝大部分是要由工业资本来承担的，因此必然要使生产成本更加昂贵。此外，战争还会使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陷于停滞状态，给经营上带来重重困难，往往导致破产。如果说，金融巨头是敢闯敢干，挥霍无度和专横暴虐的，则工业企业家是小心翼翼，精打细算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政权一旦强大有力，工业企业家就惴惴不安，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控制它。他们的利益所要求的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是一个强有力的议会。因此，与大地主和金融巨头正好相反，他们倾向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妥协性也反映出工业资本家的妥协性。一方面，他们受到地租、利息及其产品税的制约；另一方面，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又威胁着他们整个经济的利润。但是，在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威胁还显得不太大的场合，他们宁可对无产阶级采取“分而治之”的和平手段，用福利设施等等来进行腐蚀和约束，而不采取暴力镇压办法。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的时候，工业资本家十分愿意利用他们充当带头羊或盲从投票的群众，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业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似乎比以企业主利润为一方，以地租和资本利息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小些。他们把废除利息和地租看成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但是，金融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消减，因为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金融就愈来愈支配了工业。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用**股份公司**来不断排挤私人企业主。好心肠的乐观论者把这种手段看成是这样一种手段：它将使资本“民主化”，从而不知不觉地通过和平途径使资本渐渐变成人民财产。实际上，它是这样一种手段：它把中层和下层阶级不用于立即消费的金钱变成货币资本，再把它提供给金融资本家，增加他们向工业企业主收买企业的

资金，从而使他们得以把工业集中在寥寥几个金融资本家手里。没有股份制度，金融巨头只能支配他们用自己的金钱买来的企业。由于有了股份制度，他们用不着有必要的资金来收买，就能使许多企业依附于他们，从而加速占有这些企业的过程。没有股份制度，就不可能有皮尔蓬·摩根公司整个不可思议的大权（这个公司在几年之内把美国许多铁路、矿山、大多数钢铁厂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就不可能飞跃式地攫取对最重要的文明国家的工业和交通事业的支配权。

根据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J·D·洛克菲勒、C·H·哈里曼、皮尔蓬·摩根、W·M·范德比尔特和G·D·古尔德这五个人总共拥有三十亿马克。但是他们总共支配了三百多亿马克的资本，而投入美国各银行、铁路和工业公司的资本总额为七百亿马克。由此可见，因为有了股份制度，他们几乎支配了这种资本的半数，而美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又都依赖于这种资本。

这一次美国也未能幸免的经济危机也象每次那样，把小股东的资产剥夺掉了，却扩大和加强了大股东的资产。

但是，金融资本对工业的支配愈加甚，工业资本就愈来愈采用金融资本的方法。对于那些生活在其工人近旁的私人企业主来说，工人毕竟是人；如果他们还没有完全变成铁石心肠的话，他们就不能对工人景况的好坏完全漠不关心。而对股东来说，便只存在着红利；在股东心目中，工人只是一道算术题中的数字而已，他极度关心的是这道算术题的答数，看这答数是决定他更享福和更有权力，还是受到限制和社会地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主尚且还怀有的那种对工人的体恤心情，也正在消失中。

金融资本是一种最倾向于暴力的资本，并且最容易结合成垄断资本，从而取得对工人的漫无限制的权力，却毫不关心工人的疾苦；它对私人工业资本也是一大威胁，因为它愈来愈支配着整个资

本主义的生产体系。

这样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但**英国**呢?!有人会马上这样反问我。我们难道没有看见英国的阶级矛盾日益减弱吗?马克思难道没有说过,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古典国家,从而向我们显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吗?难道英国的现状不正是我们正在步入的状况吗?

热中于社会和平的人总是要我们看一看英国,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他们大声疾呼地指责我们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顽强坚持马克思的每一句话,却企图用上述马克思的那句话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打击。

但是实际上,自从《资本论》写成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已不再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正在愈来愈陷入停滞,愈来愈被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和美国所超过,以致可作一个相反的对照。英国的状况不再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未来,倒可能是我们的状况将显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英国的未来。这个论断是我们这些“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实际情况的调查而作出的,可见我们并不是不加思考地盲目复述马克思的话,而是应用他的方法来理解当代情况。

英国曾是资本主义开宗创典之乡,是工业资本最先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英国资本占居统治地位以来,不仅在本国上层阶级中,而且在国外都执了经济上的牛耳。因而它就能最自由地发扬我在上文里提到的那些工业资本独具的特点。它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暴力镇压,宁可设法去“和平地”分化瓦解他们。为此,它对工人阶级里有较强大组织的那部分人给予政治特权,力图用友善的迁就来收买和腐蚀工人阶级这部分人的领袖,而这种手段往往是很能得逞的。它对国外也放弃了强暴的做法,打出了和平和自由贸易的口号。它与布尔人和睦修好,甚至对爱尔兰也终于作出了

高姿态，要弥补百年以来爱尔兰所受创伤而给予国内自治权。

但是在此期间，外国的竞争激烈起来了，甚至取得了对英国的优势。外国的竞争迫使资本家们对内要消除一切对剥削的反抗，对外又力图用强暴措施来确保其市场。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巨头的势力逐渐渗透到全部生产过程中。从此以后，英国的面貌便完全改观了。韦柏夫妇^①在《社会实践》杂志（1902年3月20日）上认定，“过去十年里，‘时代精神’已背离了一代人以前还在雇主和工人之间盛行的‘社团自助’。实际上，富人和自由职业者阶级的公众舆论确实比一代人以前更敌视工会和罢工了。”

由于这种骤然变化，法庭十分怕事，对工会的活动严加限制。自由贸易受到关税的阻挠，以致生活费用上涨了。征服殖民地的政策又重新出现，因而再度制定了强迫爱尔兰接受的法令。除了按普鲁士模式改组军队的主张尚未实行外，英国正在完全步入德国政策的轨道，在波兰问题上，在贸易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外交和军事政策上，都将与德国亦步亦趋。

保守党的倒台、自由党的胜利，表面上遏止了这种趋势。但是，自由党和新的工人政党之间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已开始了。这难道不显然表明，可以在德国（也在美国）研究英国的未来，而英国的状况已不再成为我们的未来？“阶级矛盾缓和”和打开“社会和平”局面的阶段曾一直只局限于英国，而今在英国也已成为过去的事了。

我愿意坦率承认，我从前也对英国寄以很大的希望。虽然我并不指望英国的激进主义竟会传播到德国，但我毕竟希望，在英国，由于其特殊情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不通过社会

^① 韦柏(Sidney(Lord Passfield)Webb, 1859—1947)为英国费边社和工党的重要理论家，常与其妻(Beatrice Webb, 1858—1943)合作撰文，著有多种英国工人运动史的书籍。——译者

革命，而通过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所作的一系列进步性的让步而和平地实现。最近这几年的经验，已使我对英国所抱的希望破灭。英国的对内政策已开始按照其德国竞争者的模式来制定。但愿英国的无产阶级会对它作出相应的反应！

我们现已看得出，关于阶级矛盾日益缓和以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接近的假定究竟有多少道理。虽然不能证明这种假定完全出于凭空捏造，而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它的错误毕竟在于：它把这种局限于一个小地区的事实假定为普遍性的事实，把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与整个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并且把英国过去那种特殊的社会趋势看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增长的普遍趋势。

6. 民 主

但是，只要我们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有所预见，难道我们不可以用民主来为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一个基础，而不用与现有制度强行决裂吗？

有不少政治家断言，只有处于一个阶级的专制统治下，才有必要发动革命；有了民主，革命就成为多余的了。据说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已经有了实现和平革命所必需的那么多的民主。据说，已经有了到处成立消费合作社的可能，而随着消费合作社的日益普及和自己从事生产，就能缓慢而坚持不断地在一个个部门里逐渐把资本主义生产排挤掉。据说，到处都有可能组织工会，来限制本企业内的资本家的权力，并在工厂里实行立宪制度，以代替专制制度，从而准备向共和制工厂缓慢过渡。据说，社会民主党无论在哪里都能进入地方政府，去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干预公共事务，扩大市政设施的范围，用不断扩充地方生产来压缩私人生产。据说，社会民

主党终于能够进入议会，在议会里取得愈来愈大的影响，实行接二连三的社会改革，用劳工保护法来限制资本家的权力，并且将使大垄断企业国有化，使国营生产日益扩大。就这样，在今日已有的基础上利用民主权利，就能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引起任何震动；无产阶级用革命夺取政权的做法也就成为不必要的了。革命运动反而会起直接的危害作用，因为它采取的方式不会是别的，只会是对这种虽然缓慢但却可靠的进步过程进行干扰。

以上就是反对革命发展的人的主张。

这是他们在我们面前描绘出一幅令人神往的田园景色。在这里，也不能说它完全是空中楼阁，而确实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他们向我们提出的真理，在这里也只是一半真理。稍微用点辩证的思想方法，就能向他们提出全部真理来。

这样的田园景色只有在作为矛盾一方的无产阶级日益茁壮成长，而作为矛盾另一方的资产阶级仍然原地踏步不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这时，无产阶级即使不进行革命，也肯定会逐渐超过资产阶级，并不太引人注目地把他们的财产剥夺掉。

但是，当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增长，而无产阶级的任何进展都导致资产阶级发展新的力量并想出和采用新的抵抗手段和压迫方法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先前片面地看问题时认为有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这时就会认为有必要去组织越来越多的战斗群众，改进和采用越来越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并不断扩大斗争的领域。这也就是说，不应当再用蚕食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赢得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应当越来越扩大不断斗争的规模，并使我方的每次胜利和敌方的每次失败得以加深后果。

最不起作用的就是合作社。在合作社中，人们今日实际上只考虑到消费合作社。由于合作社的温和性质，一切反对革命发展的

人都对合作社估价很高。毫无疑问，合作社能向工人阶级提供一系列重大的好处，但若指望靠合作社来实现哪怕是部分地把资本收归公有，那就荒唐可笑了。就合作社今日正在剥夺某一阶级而言，这个阶级就是迄今还能勉力维生的小店主和面包师之类的手工业者阶层。能适合上述情况的还有这样一种现象：虽然合作社据说是要与大资本家作对的，可是到处都没有大资本家反对合作社。恰好相反，忿然起而反对合作社的，却是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那些依靠工人顾客，因而也最容易把他们争取过来支持无产阶级政策的阶层。如果说，工人消费合作社给某些工人阶层带来物质利益从而加强这些阶层，那末它却又使某些本来接近无产阶级的阶层脱离无产阶级运动。赖以实现和平吸收资本主义和取消阶级斗争的这一手段，却成了阶级斗争中引起新的阶级仇恨的新的焦点。与此同时，资本的权力却丝毫未被触动。迄今为止，合作社只在对小店主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消费合作社还面临着一场对百货公司的斗争。对消费合作社来说，这场斗争就不那么容易取胜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消费合作社的红利如果不加以分配而聚集起来，就能比资本积累还增长得快，以致超过资本的积累，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活动领域起到限制作用。这种看法也是完全荒诞无稽的。

消费合作社只有在如下情况下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有一定的意义，即用消费合作社来进行强有力的阶级斗争，把它交给战斗的无产者作为获得更大力量和权力的手段。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力量也将完全取决于立法的程度和国家政权的态度。因此，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赢得政权，消费合作社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只能是微不足道的。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比消费合作社重要得多的是工会。但工会是作为斗争组织，而不是作为社会和平组织才如此重要的。在

工会同企业主订立了私人名义的或组织名义的合同时，工会也只有靠它的斗争能力，才能使合同得到保证和贯彻执行。

但是，虽然工会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如此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无论怎样，工会都应当估计到，迟早会出现其对立面——企业主的联合组织；当这种组织采取了卡特尔，甚至托拉斯这种紧密的经营共同体形式时，它们在工会面前就很容易成为不可抵挡的了。

但是，企业主联合组织还不是对工会的唯一威胁，更大的威胁仍来自国家政权。在我们德国，这种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可是即使在民主的英国，几年前人所共知的法庭裁定就已说明，工会是克服不了各种困难的；法庭的裁定有使工会完全陷于瘫痪的危险。

上文已经提到的韦柏夫妇在《社会实践》杂志上的文章，也为此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证据，这些证据尤其能说明工会的前途。文章指出，英国的工会发展得何等地不平衡。“一般说来，强大的工会变得更强大，而那些以前就弱小的工会，**现在则比以前更弱小了**”。煤矿工人、棉织工人、建筑工人、钢铁工人的工会壮大了。农业工人、海员、缝纫工人和不熟练工人的工会则变弱了。但是，有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反对威胁着整个工会界。英国的法律尤其适合于镇压不称其心意的组织；现在用法律来反对工会的危险已增大了，而且“人们耽心，这种危险会随着对工会和罢工反感的日益增长而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法官和陪审官以及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中地位比较稳定的那部分都有那种反感”。现行的法律就足以“把工人两手紧缚，听任企业主摆布”，因此韦柏夫妇认为很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那时“法官就法律所作的解释，将使集体合同及其附带规定的有利条件，如关于集体停工和工业临时停产的规定，无法实现，或实现起来毕竟代价甚高和颇为困难。”

这种情况使工会在对付资本家时一直碍手碍脚，根本谈不上

真正限制剥削。可以设想，即使在这个一向被认为是工会理想国的英国，只要工会稍许对资本作出一点强制性的约束，国家政权就会采取什么行动。

即使在实行基层普选制的国家里，要在其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实现所谓的市政社会主义，也同样会受到限制。市政社会主义的实现势必受到总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制约，不能独立发展，越出限界。诚然，在个别的工业市镇，无产者可能在有力量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先掌握市镇的行政权，从而至少能使这些市镇的行政工作失去那种敌视无产者的色彩，并且实行一些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政权来实行的个别改进。但是，这样的市镇行政当局不久就会不仅受到国家政权的约束，而且在经济困难上得不到任何外援。最先能被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大多是那些几乎完全由无产者居住的贫穷市镇。这些市镇该从哪里获得为实行较大的改革所需的资金呢？它们在向市镇居民征税方面，照例要受国家立法的限制；即使不受这种限制，也不能过度地向当地的富裕者和富豪们征税，否则就会把他们赶出市镇，而唯有从他们那里才能弄到象样的钱。任何断然的改革措施，有时都需要靠新的税收来实现，而这种新税收不仅在上层阶级中，而且在广大居民中都会令人感觉不快。曾由社会主义者或接近他们的改革家所争取到的某些市镇的行政权，就是由于税收问题而又被别人夺去的，尽管他们当时治理得相当好。譬如在伦敦，在鲁贝，最近在德国的米尔豪森，都是如此。

再看看政治方面吧！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限制了！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劳工保护方面不断获得进展么？国会的每次会议难道没有给我们工人带来对资本主义新的限制吗？每次选举难道没有增加我们工人在国会中的代表人数吗？我们在国家里的权力以及我们对政府的影响，难道没有相应地在缓慢却无法阻挡地不断增长吗？资本对无产阶级的依赖性难道不也相应地正在增长吗？

确实，劳工保护法规的数目在一年年地增加。但是如果细看一下，那末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法规几乎总是意味着把业已存在的保护扩展到新的领域里去，比如遣散童工，对商业雇员、餐馆伙计、家庭工业者、海员实行保护等等。这种扩展大多带有非常缩手缩脚和犹豫不定的性质，而不是把业已实行劳工保护领域里的保护措施不断加强。如果细想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多么惊人的速度扩展其领域，多么迅速地掌握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一国又一国，那末就会发现，劳工保护的扩展速度就慢得多了，始终不能超过资本主义的扩展，而只是十分吃力地在后面跛行。一旦资本主义扩展的速度更快起来，劳工保护的扩展便更加陷于停滞状态。

如果说劳工保护在实行的广度上已经是很不够的，那末在深度上则几乎等于零。1847年在英国，由于宪章运动和纺织工人的迅速贫困化，曾争取到女工和青年工人的十小时工作日制，但严格说来，也只是全体纺织工人受到这种益处。而直到今日，我们在十小时工作日制方面有多大进展呢？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于1848年规定，巴黎工人全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而法国其他地方的工人则实行十一小时工作日制。几年前，当米勒朗^①使议会通过了关于有女工童工与成年男子一起劳动的企业（即不是一切企业）内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仅是一纸空文，有许多比这更恶化的情况）的提案时，这件事被吹捧为只有社会党的部长才能做出的值得惊叹的成绩。而他所给的毕竟比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资产阶级立法所给的还少，因为他使十小时工作日制也适用于童工，而英国早在1844年就规定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间

^① 米勒朗(Alexandre Millerand, 1859—1943)法国政治家,1885年起为法国议员,1899年起在资产阶级内阁中任第一位社会党部长,嗣后逐渐右倾,1904年被开除出党,1920年任总理,1920—1924年任总统,1924年被迫辞职。——译者

是六个半小时。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早在1866年就要求把八小时工作日制作为衡量社会改革成果的先决条件。但是三十六年以后，在法国社会党的图尔代表大会上，竟有一位代表反对把八小时工作日制列为我们最近的要求之一。他只希望要求“采取措施，以准备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而这位先生竟没有被人嘲笑，甚至还能在巴黎参加竞选！

由此可见，社会改革获得迅速进展的唯一结果，就是社会改革家们的谦逊。

但是，在代议机构里社会主义者议员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这很简单，只要不光看到事物的这一面，还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就自然明白。社会党议员的人数诚然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却衰落了。这种现象充分暴露在选举时其得票数字下降，而且每次选举结果都一蹶不振上。他们越来越胆小怕事和没有骨气，在对付反动势力时，只知道表示他们愿意一旦上台，就立即为推行反动政策开放绿灯。这就是今日自由主义窃取政权的方法。

但是，不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壮大而相应地减弱，就连议会也因其内部社会民主党势力的日益扩大而愈益丧失其影响。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出现的，但两者彼此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反之，没有或只有寥寥几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议会，譬如普鲁士议会，在影响和创造力方面则比别国议会削弱得更厉害。

议会的没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把议会里属于技术性的问题看成是导致没落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因素是可以通过改进议会的议事制度或职权范围而加以消除的；议会没落的主要原因取决于那些通过议会制度来对政府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诸阶级的性质。

如果议会制度要兴旺发达，那末它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要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多数派，其二是要有一个由多数派坚决要求实现并督促政府加以实现的伟大社会目标。在议会制度的全盛时期，这两个先决条件曾是具备的。只要资本主义还代表着民族的未来，则在议会中有重要地位的各阶层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众，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而多数小资产者，甚至工人，也都追随资产阶级的领导。

于是，自由主义就作为一个怀有伟大目标的团结的政党而兴起。自由主义为建立议会制度及其在议会中所作的斗争，使自由主义获得了重要意义。

从那以后，就出现了我前面所说到的新的发展情况。一种特殊的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中滋长起来，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小有产者和小农吸引到社会主义营垒中来，而小有产者和农民中的其余部分则成了十足的反动派。与此同时，工业资本中最有实力的分子则与金融巨头相结合；他们从来没有重视过议会制度，虽然有时也利用议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请看巴拿马案件^①。

自由党于是四分五裂了，而统治阶级中并没有产生另一个具有统一性质的议会大党，以代替原来的自由党。有产阶级愈反动，愈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就愈分裂成各个小派别，也就愈难于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议会多数派。只有一个办法把形形色色的派别结合成暂时的多数派，那就是要它们各自放弃要在议会中起决定作用的野心。这样的结合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极不牢靠的基础上的联盟，因为并没有任何内在联系把它们纠合在一起，而只是出于表面上权宜之计的考虑；这样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毫无成果

^① 指 1892 年揭发的有关巴拿马运河公司问题的议员受贿案。该案曾牵连许多法国议员。——译者

的,因为其成分是如此复杂,以致不要它们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等于不要它们生存。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参加到这种联盟里去,就能够缓慢地逐步进入政权,那就是异乎寻常地误解了这种联盟的实质——这种联盟是从议会制度的没落中产生的,它本身便意味着议会制度在社会和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

但是,社会发展不仅导致议会里的统一大党瓦解成许多同床异梦、甚至互相敌视的派别,而且还导致议会多数派往往比政府更反动,更敌视工人。政府虽然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可是它毕竟对整个政治和社会关系了解得更清楚。对政府来说,国家官僚机构虽然也仅仅是听命于它的顺从奴仆,但官僚机构却能以其一贯的作风和倾向对政府施加影响。而官僚机构是从知识分子中间收罗其工作人员的;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重要意义的了解,即使相当审慎而缓慢,毕竟是在逐步加深的。

这一切的结果是:政府虽然怀有敌视工人的反动思想,但往往毕竟不象站在政府背后的统治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尾巴那样盲目蛮干。从前曾经是迫使政府沿着进步道路前进的议会,现在却愈来愈成为破坏政府有时由于情势所迫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点点进步措施的工具了。随着这些靠议会制度来实行统治的阶级日益成为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议会制度也在丧失其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说对无产阶级选民群众情绪的照顾有时毕竟会迫使一个代议机构采取对工人友善和民主的作法,并且在这方面显得比政府高明,那末政府也能找到足够多的办法来撇开议会而独立行事。

在美国,反对工会的斗争与其说是由代议机构来进行,还不如说是由法院来进行的;在英国,对工会发动进攻的,也是上院颁布的法令,而不是由选民选出的下院的立法;已被否决了的颠覆问题提案的精神,在德国法庭上又死灰复燃了;德国工人对此是了

解得很清楚的。

于是，议会制度在两方面的压力下受到了夹击；统治阶级的政党和政府都愈来愈使议会制度无法取得成果。议会制度愈来愈没有能力去朝着某一方向推行一种坚定的政策。它已愈来愈显得老态龙钟和软弱无力了。要重新唤起它的青春和活力的话，只有由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来实现，即无产阶级夺得整个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夺得议会，并且使议会为无产阶级的目标服务。议会制度远远不能阻止革命的进行或者抹煞革命的意义，毋宁说，议会制度甚至还需要革命来使其重新具备生命力。

但是不能因而就误解我，仿佛我认为民主制是多余的，仿佛我认为合作社也好，工会也好，社会民主党争取进入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也好，争取各种民主改革也好，都是毫无价值的。再也没有比这种误解更荒谬的事了。恰恰相反，这一切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只有作为制止革命，也即制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时，才是毫无意义的。

民主制有产生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形式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就已经具有极高的价值了。这种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决不会再象 1789 年甚至 1848 年那样，是一场无组织的群众斗争，那时群众缺乏政治教育，对斗争着的诸因素的力量对比毫无认识，对斗争的任务和解决任务的方法没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谣言声中和遇到突然事件时便人心惶惶，陷入思想混乱。相反地，这个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将是一场有组织、有觉悟的群众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群众是坚定不移和深思熟虑的，他们不会被任何刺激所触怒，不会因受委曲而大发雷霆，因而也不会遭受挫折时灰心丧气。

另一方面，通过竞选斗争可以估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使无产阶级清楚了解各阶级和各政党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的进展和挫折，从而避免由于过早地开展行动而招致失败。但是通过竞选斗

争,也使敌人能自己认识到某些阵地无法坚守,从而自动放弃那些尚不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阵地。这样一来,斗争的规模就不至于那么残酷,那么需要重大牺牲,也不再盲目地受偶然事件的支配了。

但是,也不能把民主和行使自由权利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效估计过高。实际上它还不足以限制资本主义的统治和促进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可是,即使最微小的改革或组织性,也可能对无产阶级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再生有极大的意义。如果不要求改革或不搞组织活动,无产阶级就会毫无保障地断送给资本主义,而早就沉沦在时时刻刻威胁着无产阶级的贫困之中了。但是,无产阶级议员之所以必须在议会和地方代议机构中从事活动,以及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发挥组织的作用,这不仅是出于使无产阶级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使无产阶级在精神上趋于成熟的需要。无产阶级必须日益切实熟悉国家和地方的各种行政工作,以及经济部门中大企业的各项任务 and 办法,因为它一旦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统治阶级以后,是更需要有这种精神上的成熟程度的。

由此可见,民主制作为一种使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以适应社会革命的手段,是必不可缺的。但是民主不能用来阻止这种革命。民主之于无产阶级,犹如空气和阳光之于有机体那样,缺少了就不能发挥其力量。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个阶级的成长而忽视敌人的同时成长。民主并不妨碍资本的发展;资本的组织程度及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力量,是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增长着的。应当看到,消费合作社固然在成长,但资本的积累却同时增长得还更快些;虽然工会在成长,但资本的集中和转变为庞大垄断资本的组织程度也在更快地增长。还有一些在这里尚未进一步加以探讨的事物不妨略略提一提:社会主义报刊诚然在成长,但无党派的、无骨

气的报刊也同时在成长，它们正在麻醉和毒化着广大人民群众；工资固然在增加，但利润额增加得还更快；议会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人数虽然在增加，但议会的作用和意义却越来越减小，而与此同时，议会多数派和政府则越来越依赖金融巨头的势力。

因而，在无产阶级发展其权力手段的同时，资本也在发展其权力手段，其结局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两者之间的一场大决战；而这场大决战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前是不会告终的。

资本家阶级既成为多余的，无产阶级便相反地成为社会上最必不可缺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已处在既不能征服又不能根除无产阶级的境地。无产阶级即使在每次失败之后，也必然会重新站起来，比以前更具有威胁性；反之，无产阶级只要取得打倒资本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就能夺得政权，并使其政权不作别用，只用之于消灭资本关系。资本关系一天不消灭，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也不可能结束。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产生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实现它的任何基础。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空想。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假定，资本主义结束的方式会不同于它开始的方式。无论经济发展或政治发展都没有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革命时代已告结束。社会改革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加强，都不能阻止革命。它们更多地发挥其作用的结果，只能导致战斗的无产阶级产生出更先进的分子，从而使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从争取初步生存条件的斗争，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

7. 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

但是，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将采取什么形式呢？我

们能预料决战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吗？无产阶级在决战时将使用什么武器呢？

对这些问题，很难给以确定的答复。我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事物发展的方向，却不能推测出事物发展的形式和速度。在探讨发展的方向时，只需要相应的注意到一些简单的规律，因而可以把那些虽然错综复杂但却不是我们认为合乎规律的或必要的现象撇开，甚至撇开我们认为纯属偶然的现象。但是，偶然现象却在确定运动的形式和速度时起着很大的作用。譬如说，在上世纪的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里，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每个国家里，其形式和速度则是大不相同的。地理特点，种族特性，邻国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大人物的阻挠或促进，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许多因素是无法预先认识到的，而这些无法认识的因素又互相给予对方以巨大的影响，以致情况会变得极度复杂，按迄今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是不可能事先预见的。因而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使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能对我们文明国家的社会状况有彻底而广泛的了解，能在研究工作上以其前后一贯和富有成果的方法而比同时代人远为高明的人，虽然能预先断定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方向，并被事态的发展过程出色地证明其预断是正确的，但有时在研究今后几个月情况发展的形式和速度上还可能发生重大的差错。

我相信，关于未来的革命，只有一件事是今天已经能有把握讲的，即未来的革命形式将与以前的革命完全不同。革命者和反对革命的人常常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按照以前的革命模式来设想未来的革命。而且因为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论证这种革命已不再可能发生，那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概念似乎根本就是陈旧的概念。在世界史上我们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革命斗争：这种革命是由一个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的组织，在利用民主

形式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所反对的首先是企业主联合组织这样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在这个权力面前，甚至专制君主都会屈服，而且它的力量还被现代大国从专制主义那里承袭下来的权力手段——官僚机构和军队所加强。

正如前面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当前形势的特点之一是：在某些国家里，对我们进行最激烈抵抗的，已不再是政府了。以前的革命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在专制制度下，政府的力量占优势，阶级矛盾不能明显地展现出来；政府不仅阻止被剥削阶级自由地维护其利益，而且还阻止剥削阶级自由地维护其利益。只有一部分剥削阶级是站在政府那一边的，更大的另一部分剥削者，尤其是工业资本家，是站在反对派阵营里的；在反对派阵营里的还有全体劳动阶级，包括无产者，小有产者和农民（某些落后地区不在此列）。因此，政府在人民中是孤立的，得不到广大人民阶层的支持。它代表着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最主要力量，因此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一举而推翻之。

在民主制度下，不仅被剥削阶级能更自由地成立其组织，剥削阶级也能更自由地成立其组织；剥削阶级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们想保卫自己以对付日益强大的对手的话。这两个敌对阶级的力量，都比它们在专制制度下更强大了；它们都能比政府本身更毫无顾忌和更毫不妥协地运用其权力手段；政府已不再凌驾于它们，而是对之甘拜下风了。

因此，革命者们不仅要对付政府，而且还要对付各种强大的剥削者组织。革命者们已不再象在以前的革命中那样代表人民的绝大多数反对一小撮剥削者。他们今日基本上只代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对面的，不仅有整个剥削阶级，还有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及一大部分知识分子。

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小农和某些小资产阶级（后者实

际上是雇佣劳动者，或者是依靠工人顾客的)能同无产阶级联合。但是他们有时是非常不可靠的盟友。他们恰恰缺少无产阶级那种藉以发挥其全部力量的武器——**组织**。

因此，如果说以前的革命是人民奋起反对政府，那末未来的革命(也许俄国不在此列)可能更多地带有一部分人民反对另一部分人民的斗争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但仅仅在这一点上，它将不大象法兰西革命型，而接近宗教改革战争型。我几乎想说，它将不大象一场突然奋起反对当局的暴动，而更象一场长期的**内战**，如果不把这个词与真正的战争和厮杀的概念联系起来的话。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假定，带有街垒战和类似战况的**武装起义**，在今日的西欧还能象从前那样起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俄国的经验证明，街垒战能有效地使**军心涣散**的军队在瓦解时产生其本身的觉悟，从而使纪律完全涣散。

除了街垒战之外，**财政困难**也是以前的革命最重要的依据。它今日在俄国还起作用。但是在西欧，财政方面的形势与1789和1848年完全不同了。当时，资本主义还很弱小，资本的积累甚少，获得资本是罕见和困难的。同时，资本对专制制度的态度有一部分是敌对的，有一部分至少是不信任的。政府也毕竟不依赖资本，尤其不依赖工业资本，甚至有时(即使大多不是故意的)还大大阻碍资本的发展。但是，垂死的封建主义导致了一切物资财富的枯竭，于是政府能从全国榨取的金钱愈来愈少，愈来愈依靠借债度日。这必然导致财政崩溃或向新兴的阶级让步，而让步和财政崩溃的结果，必然引起政治崩溃。

今日则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并不象封建主义那样导致生产不足，而是导致生产过剩，并将在其自己的脂膏中闷死。现有的资本也不是不足，而是过剩，只有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才没有过剩现象。因此，资本充斥于市，力求投资以图盈利，并且竟不怕风险。政

府既要完全依赖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阶级也有种种原因要保护和
支持政府。这时国债的增加只有达到如下限度才能成为革命因
素：它加重了税收的负担，从而激起了下层阶级的愤然反抗；但是
它几乎不能（如上文所讲，俄国例外）使政府直接面临财政崩溃，甚
至不能使政府哪怕只遭到财政上的严重困难。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施加压力和进
行斗争的手段是有组织地拒绝干活，即罢工。它具有比财政困难
或武装起义更大得多的重要意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发达，资
本愈集中，罢工的规模就愈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排挤小资产
阶级的生产方式，整个社会就愈依赖资本主义生产的顺利进行，而
大规模的群众罢工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任何严重扰乱，都会
变成民族灾难，从而酿成政治事变。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
时，就很容易产生利用罢工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想法。它已经在
法国和比利时，在意大利，尤其在俄国，作为政治斗争手段出现了，
并且在这些国家应用得很成功。它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肯定会起
重大的作用。

这很久以来就一直是我的看法。在我论述 1891 年新党纲的
文章里（《新时代》1890—1891 年度，第 50 期，第 757 页），我指出
了这种可能性：“在某种情况下，如果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如果暴力
事件极深刻地唤醒了工人群众，那末大规模的罢工就能产生巨大的
政治效果。”

我的话当然不想表达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工会运动者所怀有
的那类总罢工思想。他们是要用总罢工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活
动，特别是议会活动；要使总罢工成为一举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
手段。

这是无稽之谈。在这个意义上的总罢工——一国的全体工人
得到某一信号之后统统停止工作——要以工人的团结一致和组织

起来为其前提条件，这在今日的社会里是几乎办不到的；如果一旦真能达到这种地步，那就势必有了如此不可抗衡的力量，以致也就不需要总罢工了。这样的罢工将不仅一举而使现存的社会不可能存在，而且使现存社会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从而使无产者早在资本家之前就不可能存在；这就必定会使无产者在恰恰正要开始发挥其革命作用的时刻不得不陷于崩溃。

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罢工，几乎永远不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肯定不会）采取一国的**全体工人统统罢工**的形式；罢工也不能负起**代替**无产阶级其他政治斗争手段的任务，而只能负起**补充和加强**它们的任务。我们正走向这样一个时代：这时，在企业主组织的优势之下，孤立的非政治性罢工是没有成功希望的，正如在资本家控制的国家政权的压力下，工人政党孤立的议会活动是没有成功希望那样。因此越来越有必要把罢工和议会活动都推动起来，并使这二者互相配合而发挥新的力量。

使用政治罢工也同使用任何新武器一样，必须首先学习。它不仅不象无政府主义者所吹嘘的那样，是万应良药式的手段，而且也不象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信赖的手段。

除此之外，还可以发展出我们今日还无法梦想的其他的斗争手段和方法。在对斗争**方法**和斗争**组织**的认识与对社会斗争**方向**的认识之间，确实也有这样的区别：后者是在理论上可以事先研究出来的，而前者则从实践中创造出来、事后才由理论家加以观察并且探讨其对于今后局势发展的意义。工会、罢工、股份公司、托拉斯等等，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不是从理论中产生的。还可能出现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斗争方法和组织。

战争也可能成为加速政治发展和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一种手段。战争曾常常证明是一种很革命的因素。历史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形势：革命已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必要的了，但是革命

阶级还太弱小，还不能推翻统治势力。有了革命的必要性并不就等于新兴的阶级恰好在那时获得恰够的力量。可惜，世界上决没有这么合适的事情。倒是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已有绝对必要由一个新统治阶级来替换旧统治阶级的形势下，旧统治阶级却仍有办法来压制其新的对手。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太久，那末整个社会就会沉沦没落和腐败瓦解。但是在这种形势下，战争常常会完成新兴阶级还无力完成的这一任务。这时，战争只有在充分调动了全部人民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民族发生深刻分歧，战争就会迫使统治阶级向新兴阶级让步，而统治阶级便不得不以国家民族为重，让新兴阶级获得其平时决不可能获得的巨大力量。

如果统治阶级不能作出这种牺牲，或者作得太迟，战争就很容易导致对外的失败，从而引起国内的崩溃。因为，只要军队失败了，以军队为主要支柱的政权也就完蛋了。

这样，在其他手段都失灵的某种情况下，战争便显然是导致进步的有效手段，哪怕它具有残忍粗暴和极大的毁灭性。

例如，德国资产阶级便是由于当时的经济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诸国，并且由于三十年战争及其后果而被削弱得太厉害，以致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推翻封建专制政体的。后来靠拿破仑战争以及其后俾斯麦时代的几次战争，德国资产阶级才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1848年法国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也主要是靠以前早就建立起来的反革命军队的几次战争来实现的。最近，日俄战争同样也十分有助于迫使俄国走上革命的道路。西欧的情况也绝不是保险能免于一次战争的，而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今日已处于一种类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样的对内和对外政治矛盾的时期。现在又到处安上大量的政治导火线了。悬而未决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愈来愈严重；但是没有一个统治阶级和政党敢于认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若不引起巨

大的震动是不可能解决的。而他们由于领教过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便总是提防着这种震动，生怕任何较大的震动都有引发无产阶级巨大力量的危险。

我在上文已经指出过国内政治生活的恶化，这种恶化在议会制度日益衰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与它伴随而来的，还有外交政策上的恶化。有人耽心强有力的政策会引起国际冲突；这不是从道德上反对战争，而是由于害怕革命，害怕战争成为革命的先导。因此，我们的摄政王在治国艺术上，便把内政外交方面的一切问题长期搁置起来，让未获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还有不少国家，如土耳其和奥地利，也是靠这种办法残存着的，这些国家早在半世纪以前就把那种较有实干精神的一代革命者置于死地；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理由，资产阶级对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的兴趣已完全没有了。

但是这些危机温床并没有熄火，无论哪一天它们都能象马丹尼克岛^①上的贝莱火山那样重新燃烧起来，并点燃那种摧毁一切的战争之火。经济发展在统治阶级中唤起了要垄断市场、要征服海外属地的贪欲，并且用金融巨头的强暴观点代替了工业资本家的倾向于保持和平的观点，从而经济发展本身就创造了新的危机温床和危机原因、新的摩擦面和战争纠葛的新缘由。

今日，和平的唯一保证就在于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惧怕。在冲突的原因不能增多的情况下，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还有待于看看再说。现在有一些完全由肆无忌惮和残酷凶暴的贵族地主和金融巨头集团统治着的国家。这些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正以最大的危险威胁着世界和平。我们必须估计到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从而也估计到发生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这种动

① 西印度群岛中的小安的列群岛的第二大岛。——译者

荡若不直接以无产阶级的奋起发难而告终，就至少毕竟能为这种奋起发难开辟道路。

但愿不会误解我。我这里是在探讨，我不是在预言，更不是在这里表示希望。我是在探讨什么事**可能会**发生，而不是宣称什么事**必定**会发生，尤其根本不是在要求什么事**应该**发生。如果我在这里把战争作为一种革命手段来讲，那末这并不是说我希望有战争。战争的恐怖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以致今日也许只有军事狂热分子还执迷不悟地有勇气去冷酷无情地要求战争。但是，即使革命不是手段，而是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代价，哪怕是最血腥的代价都不算太昂贵的话，也仍然不应该希望利用战争来作为发动革命的手段，因为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缺乏理性的手段。敌国的入侵会造成骇人听闻的破坏，会对受害国提出大量的苛求，从而导致受害国爆发革命；而革命遇到的是本不归它承担却强加给它的一些最沉重的任务，这些任务，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把革命的全部手段和力量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由于战争而引起的革命，有时会恰好发生在革命阶级正处于无能为力的时刻，因为战争让革命阶级过早地负起了它当时还弱小得无力解决的那些任务。由于战争会造成人员的牺牲，并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精神上 and 道德上的衰退，战争本身也可能使革命阶级进一步遭到削弱。因此，革命政权在任务上加重了负担，而在力量上却被削弱了。因此，由战争引起的革命往往更容易失败，或者过早地丧失其动力，如果产生动力的基础不甚牢固的话。由一次人民起义而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靠一连串战争而输入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其成果何等地完全不同啊！另外，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不是由 1870—1871 年战争过早地强加给巴黎无产阶级，而是在较迟的时机才发生的话，巴黎人就会获得足够的力量，可以不经战争而推翻路易·拿破仑及其匪帮，这对无产阶级的事业将

有多么大的贡献啊！

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希望用战争来人为地加速我们的进展。

但是，一切事情不会总是顺应我们的希望而来到的。虽然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但是人类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来选择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来选择他们的生活条件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果事事都会顺应我们的希望而来到的话，我们中间谁不宁愿要和平的途径，而不要暴力的手段。我们的个人力量也许还不足以应付暴力，却让暴力把我们吞噬掉。但是，我们的任务不在于表示虔诚的愿望并且要求世界顺应我们的愿望，而在于认识现有的任务、条件和手段，以便利用这些条件和手段来适当地解决这些任务。

研究实际情况，这是合理的政策的基础。正是研究了实际情况，我才获得了我在本书第一版里所讲过的这一信念：我们又在走向一个革命时期；这个信念已如我所料地被俄国革命的爆发证实了。

反对这种“革命浪漫思想”的，也仅仅只有一种常常有人提出的异议，这就是：对于在西欧的我们来说，俄国的情况不会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据说西欧的情况与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

我当然不是不知道其间的区别，虽然我们也不能夸大其区别。俄国工人阶级并不象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落后。正如英国工人必须改掉他们把德国无产阶级藐视为落后者的通病那样，我们在德国的人也必须纠正我们把俄国无产阶级看成落后者的偏见。

但是，西欧与俄国的区别当然是有的，而且还很大。这里主要讲两点区别。第一，在俄国，革命作为推翻统治政权的斗争是几乎一切阶级的事，尤其是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事。俄国的产业无产阶级在其革命斗争中，不仅代表其本阶级利益，而且代表全民

族的群众利益。但这时，推翻俄国统治政权是无产阶级从贫困中谋求翻身的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在其阶级斗争中赖以坚持阵地的伟大武器，就是**群众组织**。没有**政治自由**，没有**结社权**和**集会权**，没有**出版自由**，这种组织就不能发展；但是，除了工会组织之外，无产阶级还迫切需要独立的政治组织，以便能在面对着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实现其阶级利益。而且，为此还必须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无产阶级需要这些权利，正如需要面包、需要空气那样。它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迫切需要这些权利。因此，它比其他一切阶级都更需要对任何拒绝给它这些基本权利的政权进行**决死斗争**，也就是更需要反对专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比其他一切阶级都更需要革命化。

西欧无产阶级的处境就不同了。在西欧，资产阶级已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站稳了脚跟，因而基本上已争取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或者只对一些小事情心怀不满，而用不着为这些小事情发动革命；或者象某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那样，在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遇到苦难，那末他们只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谋求改善，但也只限于在现有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以恢复昔日光景为限度和通过支持反动政党来实现。

面对着无产阶级，他们结成了一个愈来愈紧密的作战方阵。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成为民族的广大群众时才能指望获得胜利。今日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事实。在德国，雇佣劳动者已占就业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三**。在革命事业上可加以考虑的这些德国居民阶层，按所占比例来算也许同俄国的差不多，但作为有共同利益的统一阶级，则人数比俄国的多得多。这一区别并不足以说明德国的革命比俄国革命更困难。

我们也没有丝毫理由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程度比俄国无产阶级轻些。恰恰相反，我们已经看出，随着资本主义向前发

展，无产阶级遭到的剥削愈来愈厉害了。如果说，德国工人的状况比俄国工人好得多，那末这是因为德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高得多，而且按国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来说，德国工人的需要也多得多，因此德国工人比俄国工人更痛心得多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枷锁。

但是，德国工人有一点比俄国工人强，那就是有**较高度的政治自由**，能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并依靠强大的组织而获得更大的力量。这是西欧工人比起俄国工人来最大的有利条件；西欧无产者的革命条件之所以与俄国无产者完全不同，其原因也就在此。

恩格斯早就认定，我们目前靠利用现有的合法基础就最能兴起；如果我们铲除这些合法基础，那末我们就是傻瓜。但正是从这一认识中，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愈强大，我们的敌人就愈觉得有必要采取暴力手段，使我们不可能走合法途径，因而他们就成了逼迫西欧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了。

但愿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似乎民主形式的存在会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似乎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更乐于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超过他们。近年来，除了沙皇当局之外，恰恰是一些民主共和国，如瑞士、美国和法国，使用暴力对付罢工者的次数是最多的。在选举上弄虚作假以及在法庭和警察恐怖主义方面，美国现在已打破纪录；另一方面，企业主组织已愈来愈懂得要实际上废除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结社权，从而把无产阶级逼得走投无路。

当然，用法令来废除选举权和结社权，这在一个非民主国家里，譬如在德意志帝国里，就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容易，因而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也更大。但这时，无产阶级无疑地会被迫进行生死决战，而这一决战可能仅仅以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开始，从而扩大

成反对整个统治政权的斗争，即扩大成革命。

由此可见，政治自由在西欧的存在，并不排除发动革命的可能性，但是这场革命当然会具有与俄国革命不同的出发点。如果说，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一开始时就采取**进攻性的**革命行动（因为推翻现存制度是无产阶级任何成功的行动的先决条件），那末西欧无产阶级的任务则是要保持和利用他们业已获得的那一点点政治自由；因此可以说，西欧无产阶级的行动首先是要**保卫**现有的权利。但是，胜利的行动是不能用单纯防御方式来完成的。敌人愈蹂躏现存的自由并且愈限制无产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就会更快地被迫转入进攻，革命斗争的时刻就会更快地到来。

我们西欧无产阶级绝不能高枕无忧，满以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最大的困难业已过去，满以为现有的政治自由就向我们提供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保证。虽然想到这些是可喜的，但可惜我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夺取政权——这个最重大和最艰巨的斗争还在我们的前面，只有在长期艰苦的搏斗中才能决定这场斗争的胜负。我们必须在这场搏斗中，尽可能地动员出我们的全部力量。

最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莫过于劝告无产阶级立即解除武装，以便争取到资产阶级的所谓让步与和解。在目前形势下，这不意味着任何别的，只意味着把无产阶级交给资产阶级任其摆布，让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赖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意志衰退和蜕化变质，没有能力去担当它的伟大历史任务。

英国工人的情况就足以证明这样说并非夸张。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有更多的无产阶级，更发达的经济组织，更大的政治自由。可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英国无产阶级迄今在政治上更毫无权力了。在最近以前，英国无产阶级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一切独立性，甚至已不再能维护其最切身的利益。

在这方面，也可以由上文已一再提到过的韦柏夫妇来提供证词；他们肯定不会是有革命思想嫌疑的消息来源。上面已提到过的那篇文章说：“在过去十年的繁荣时期内，英国工人对‘劳工政策’的兴趣逐渐减少了。工人们在思想上渐渐不再关心八小时工作制，并且对1890—1893年间工会曾那样热情追求过的费边式的建设性社会主义也不再向往了。同时，下院的工人议员人数也并没有增加”。

甚至不久前挨到敌人的皮鞭，也未能使英国无产阶级振作起来。英国无产阶级对摧残工会的行为默不作声，对提高工人的面包价格也不发一言。只是到了最近，英国工人才激动起来，有了较强烈的要求改变这些现实主义政策的倾向。工会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要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工人政党，以便对抗自由主义。

但在推行现实主义政策时，无产者随着政治力量的丧失，道德上和思想上同时也在日益退化。

我在上文曾讲到无产者在精神道德上的再生，即无产者已从现代社会的野蛮人变成了保持和发展我们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只有在无产者与资产阶级处于最尖锐对立状态的国家里，无产者才能如此奋发振作；在这种国家里，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能使无产者随时随地意识到，他们负有使整个社会随着无产者一起上升到更高阶段的使命。在这方面，英国却又一次向我们表明工人阶级已陷入什么境地；他们放弃了革命，只推行现实主义政策，嘻皮笑脸地抛弃了自己的理想，拒绝一切不能以英镑和先令来体现的斗争目标。连资产阶级都亲口抱怨英国工人上层分子在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堕落。这些工人上层分子亦步亦趋地效法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们今日几乎已不是什么别的，而只是小小的资产阶级，只是在较为不斯文这一点上，才与其他资产阶级有所区别；他们最崇

高的理想就是效法其主人，摹仿他们伪善的装腔作势的样子，羡慕他们能捞到财富，过着行尸走肉似的消闲生活。在他们看来，自己阶级的解放显得是荒唐可笑梦想；反之，足球、拳击、赛马、赌博，却深深打动他们的心弦，占用了他们整个的空闲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

想要用道德说教来向英国工人灌输更高尚的人生观和奔赴崇高理想的观念，这是徒劳无功的。无产阶级的道德只能产生于革命的愿望；有了革命的愿望，无产阶级就会更加坚强和高尚。正是革命的愿望才使无产阶级从最深沉的屈辱地位中惊人地振奋起来，而成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事件。

我们必须首先坚持革命的理想主义，才能在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下都承受得了最沉重的担子，完成最崇高的事业，不辜负有待我们去完成的伟大历史任务。

二、社会革命后的日子

1. 任务的限度

在我论及这里探讨的对象本身之前，我必须首先澄清一下由于我的论文标题中有“革命后的日子”而使某人心中产生出的严重的疑团。“革命后的日子”！这岂不证明，我们“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无非是变相的布朗基主义者而已么？布朗基主义者是指望有朝一日能以暴力行动夺取社会专政的，那末我们今天就来考虑和设想这样的日子，而这样的日子会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来到，我们还毫无所知，这岂不是重蹈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种思想方法的覆辙吗？

的确，如果文章的题目果真象上面所说的那样，那末就有种种理由对那篇文章表示极大的不信任。因此，我要即刻说明：我认为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或多或少地要在艰苦斗争中延续达数十年之久；而我深信，我们的任务并不在于为未来的菜馆设想出一些烹调术。为此，只举一个例，说明我是不大赞成这种做法的。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十五年以前讨论新纲领时，有人建议纲领中应要求采取一些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措施。当时我是属于反对把这种要求列入纲领的那一派的，因为我认为那样做是错误的。党不应当在情况还根本无法知道，而我们只能对它作一些模模糊糊的设想，并且还有可能遇到许多意外而与设想不合时，就为自己规定一条确定的途径。

但是我却认为，为了锻炼思考能力，提高政治认识和政治觉悟，不妨允许我们尽可能事先估计我们努力的后果，并且事先研究一下我们夺取政权以后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样做在宣传上也是颇有价值的，因为一方面，我们的敌人硬说我们将由于胜利而面临无法解决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队伍里也就能培养出一些人才，不至于对我们胜利的后果全然无知，把未来说得一团漆黑。据说，对我们来讲，胜利之日也就内在地孕育着失败之日。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一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以及有多少道理，毕竟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想在这种思想工作中获得一定的结果，并且不至于陷入争执不休，那末就必须把行将出现的问题放在一个最简单的形式中来加以探讨，而事物的这种简单的形式实际上是绝不会现成成的，必须从一切复杂的情况中抽象出来才能找到。这是一种在科学上惯用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时，人们大概始终都意识到：实际上，事物并不是象在抽象的情况下那样简单和那样顺利地发展着的。我已经说过，社会革命是一个要经历许多年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想把它还原到其最简单的形式，那末我们首先必须假定，无产阶级在一个大好的日子能一举而毫无限制地获得全部政权；同时，无产阶级在行使政权时能完全只从阶级利益出发，并且会十分适当地运用政权。前一种假定是肯定不会成立的，后一种假定也未必会成为始终如一的情况。对此，无产阶级本身还团结得不够，不足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所周知，无产阶级还分裂为不同的阶层，其发展历程不同，其传统不同，其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但是，其他与无产阶级在社会地位上接近的阶层，如小资产阶级或小农的某些部分；也很可能与无产阶级同时兴起；他们的想法与无产阶级的想法不完全相同，从而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和错误主张，因此我们不会永远都称心如意，想

怎么办就能怎么办，也不可能永远坚持做那些在一定情况下对无产阶级持久解放最适当的事。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不去考虑这些干扰因素。

另一方面，我们在进行这种探讨时，必须从人所共知的前提条件出发，不能把将来可能出现的情景作为基础，否则就会使我们陷入异想天开或故弄玄虚的狂想。我们不可能在今日的情况下取得统治地位，这毕竟是不言而喻的。革命本身，必须以长期深入的斗争为前提；只有通过这样的斗争，才会改变我们今日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将会出现一些我们今天还不可能认识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正在考虑的某些问题，也要到那时才能最终解决。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把我们今天不再怀疑的各种问题加以重新解决的新的办法。

正如物理学家在真空中而不在流动的空气中研究落体定律那样，我们在这里研究获胜的无产阶级的形势，也是把它置于本来绝不会十分单纯的前提下来考虑的，也就是在假定无产阶级明天一举而取得完全统治的同时，对它那时所能掌握的解决其任务的手段则只看到今天现有的。这样做，可能使我们得出的结论与未来事态的实际进程之间的差别，有如落体定律与物体实际坠落之间的差别那样相去甚远。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偏差，落体定律还是实际存在着，而且适用于各种具体物体的坠落；人们只有首先懂得了这个定律，才能了解这种现象。

因此，我们只要遵循一个能保证我们运用正确方法的探讨途径，就能为胜利的无产阶级揭示出他们的前景和可能遇到的障碍；这样做，对于他们进行社会革命和取得革命成果，无疑会起决定性作用的，即使将来实际的情况与这里揭示的情况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而且毕竟只有遵循这一途径，人们才能对社会革命的前景作出符合科学的判断。谁要认为这一途径还太不可靠，不可能看

出社会革命的征兆，那末他就只好在人们谈起社会革命时完全保持缄默，或者只消简单地说一句：“谁经历过，谁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这无可否认地永远是最稳妥的途径。

属于可供讨论之列的社会革命问题，只限于那些可以用这里提供的途径来加以认识的问题。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既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所能作出判断的。

2. 剥削者的被剥夺

现在让我们假定，有朝一日大好的日子来到了，无产阶级在这一天一举而取得了全部权力。那么，开始该做什么呢？当然不能根据这样那样的理论或情绪想要怎样开始，而要由它本阶级的利益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来决定必须怎样开始。

首先，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是补做那些资产阶级忽略的事。它将扫除一切封建残余，把资产阶级一度主张过的民主纲领付诸实现。无产阶级作为一切阶级中地位最低的阶级，也是一切阶级中最民主的阶级。它将在一切机构中实行普选制，实现充分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使国家不依赖教会而独立，并将取消一切世袭特权。无产阶级将帮助各市镇地方实现完全自治，并用**人民武装**和**裁军**方式消除军国主义。人民武装是出于**政治**上的要求，裁军则出于**财政**上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前者的费用可能与常备军的费用相当，但它对巩固民主来说是必不可缺的，以便从政府手里把对付人民的最重要的实力手段剥夺掉。裁军的宗旨首先是**削减军事预算**。裁军有时也可以通过加强政府的权力来实现，即只消用听任摆布的游民无产者的小军队来代替普遍兵役制的大军队就行；因为游民无产者是只要有钱拿就什么事都愿意干的。无产阶级政权则必须力求使人民武装同裁军配合起来，既要武装人民，又要

不再继续重整军备，不再制造新的步枪大炮、装甲军舰和构筑要塞。为此要缔结国际协定，消除一切资产阶级竞争引起的国际冲突的根源。

不待说，获胜的无产阶级还要对税收制度实行彻底的改革。无产阶级要废除一切今日由劳动人民承担的税收，也就是首先废除那些使食物涨价的间接税。为此，要用累进所得税或累进财产税来使大收入和大财产更多地担负国家的开支。我在下文还要回过头来论述这一点，因此这里提一提就够了。

但对我们来讲，**教育事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无产阶级政党一向都关心国民教育事业。早在中世纪的旧公社教派里，国民教育事业就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从有产阶级手里把教育事业的垄断权夺过来，也必须永远是无产阶级思想界的一个愿望。新政权应当义不容辞地增设和改进学校，并给教员以优厚待遇。但还要走得更远些，多做一些。诚然，获胜的无产阶级即使在思想上如此激进，仍不能一下子就消灭阶级差别，因为阶级差别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产生的，不能象用海绵刷在黑板上把粉笔字擦掉那样简简单单地就把阶级差别及其后果擦掉。但是，学校可以朝这个方向闯出新路，并对消灭阶级差别作出十分重大的贡献。比方说，让全体儿童都同样吃得好，穿得好；受同样的教育，在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上都获得同样的可能性。

不能过高估计学校教育的影响。实际生活比学校教育更强有力，凡是学校教育与实际生活发生矛盾之处，学校教育总是甘拜下风的。譬如说，如果我们试图在今天就用学校来消灭阶级差别，那末我们这样走不多远就会碰壁。但是，只要学校能在实际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它就能十分强有力地促进和加速这种发展。因此，在使社会朝着消灭阶级差别的方向发展，学校也是能起先锋作用的，至少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正在学校里成长着的一代人，去认

识那些已经在整个社会里随着这一代人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新事物。

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激进派早已提出过而未能加以实现的目标，因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有实际力量，并且丝毫不为资本着想，这是任何资产阶级也无法做到的。举例说，根据我在土地问题一书中所作的计算，在德国要实行一种这里所设想的新学制，每年将需要十五亿，甚至二十亿的巨款。这几乎是目前军费预算的两倍！只有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才有能力为学校教育毫不迟疑地拿出这么庞大的巨款。

但是，革命决不能停留在这种改革上。我们要进行的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上面已经讲过，我们现在不想探讨无产阶级根据这种或那种理论想要做什么，因为我们真不知道还可能出现一些什么理论，以及革命将在什么情况和影响下贯彻下去。我们只想探讨：获胜的无产阶级在经济情况的逼迫之下将被迫做些什么，如果无产阶级想要做得正确无误的话。

这里有一个凌驾于其他一切问题之上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政权必须首先处理的。无产阶级，无论如何应当使**失业者的苦难**问题得到解决。对工人来说，失业是最邪恶的晦气事，因为失业使得工人贫困、屈辱和犯罪。工人是只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如果他们找不到劳动力的买主，他们就要挨饿。即使在他们有了工作时，失业也在威胁着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一天能保证不因失业而陷于贫困。无产阶级政权无论如何必须结束这种状况，即使无产者在思想上还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自由派，就象在今天的英国那样。我们这里不去探讨怎样解决失业问题；对此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不少社会政策家提出过各式各样的建议。大家知道，资产阶级中也有人试图对付失业的苦难，并且设计了失业保险制度，其中有一部分制

度业已建立。但是，资产阶级社会只能在这方面小手小脚地点缀一下，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象锯树人锯掉自己所坐的树枝那样，自己也从树上掉下来。只有无产阶级，只有获胜的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必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消除一切失业的苦难，无论是由于疾病或其他什么原因而失业的。对失业者给予真正充分的支援，必然会完全改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无产阶级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使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如果说工人今日要把自己出卖给企业主，如果说他们不得不受企业主剥削和奴役，那是失业的幽灵和饥饿的皮鞭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反之，如果工人有了生存的保证，即使他们没有工作，他们要对资方将一军，就再容易不过了。这时，工人就不再需要资本家了，而资本家若没有工人就不能再办工厂。如果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那末每逢企业主与工人发生冲突时，企业主就会认输，被迫让步。资本家诚然还能继续担任工厂的领导人，但已不再是工厂的主人和剥削者了。但是，资本家一旦认识到，他们的权利仅仅是承担风险和负起资本主义事业的重担，这些先生们就会成为首先放弃继续资本主义生产的人，并且力求有人来收买他们那些确已不再能从经营中盈利的企业。我们看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举个实例：在爱尔兰，当佃农运动达到高潮时，地主无法收取地租，于是主动要求国家收购一切土地。我们可以预料，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即使这个政权并不是从社会主义理论出发，一开始就想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资本家仍会要求收买他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是彼此不相容的。谁承认前者存在的可能性，谁就必须承认后者消失的可能性。

这时可能出卖其企业的资本家们，会找到什么买主呢？有一部分工厂、矿山等等，可以卖给在其中干活的工人，以合作社的方式来继续经营。另一部分企业可以卖给消费合作社，其余的可以

卖给地方或国家。显而易见，资方大多会去找最有支付能力和最殷实可靠的买主——国家和地方，因而大多数企业就会变成国家所有或地方所有。人所共知，社会民主党一旦执政，是会一开始就力求采取这种解决办法的。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不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的无产阶级^①也会主张一开始就把那些由于自然因素（譬如矿山）或组织方式（譬如托拉斯）的缘故而垄断化的企业收归国家或地方所有。因为垄断企业今日不仅对工资劳动者来说，而且对企业界以外的社会各阶级来说，都已经是无法容忍的了。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面前软弱无力，因而不敢去收拾垄断企业。无产阶级革命却必然要废除垄断事业的私有制。垄断企业今日已很强大，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了支配地位，而且正在迅速发展。其国有化和地方化本身就意味着由社会及其机构——国家和地方来支配整个生产过程。

最适宜于国有化的，是全国性的交通工具（铁路）以及原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矿山、森林、冶金、机器制造等等）。这些部门是大企业和托拉斯组织高度发展的场所。供个人消费的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以及零售贸易，主要带有地方性，而且还非常分散。在这些行业里，地方和合作社占居主要地位，国营企业则起次要作用。但是随着分工的日益发展，个人直接消费品的生产相对地将愈来愈退居到次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地位，从而国营生产的领域也会日益扩大。同时，由于交通和大企业的发展使一些行业相继排除地方市场的障碍而具有全国性，国营生产的领域便更加扩大了。举例说，煤气照明当然是一种地方事业。但是，由于山区电气照明和电力输送的发展，有必要实行水力的国有化。这就导致照明事业由地方事业变成了国营事业。又如，从前制鞋业是依赖地方市场的。

^① 指英国工党。——译者

但当制鞋工厂的产品不仅供应一个市镇，并且供应全国时，这类工厂就不宜于地方化，而宜于国有化。制糖厂、啤酒厂等等的情况莫不如此。

由此可见，情况的发展会有这种趋势：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会愈来愈使国营企业成为主要的企业形式。

关于大企业（农业大企业当然也属于这个范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暂时就讲到这里为止。那末金融资本和土地所有制应该怎样处理呢？金融资本是资本的一部分，它采取放债收取利息的形式。金融资本家并不在经济生活中履行任何个人职务，他们是多余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把他们一笔勾销，予以剥夺。人们尤其愿意采取这种步骤，因为恰恰就是资本家阶级中的这一多余部分，这些金融资本家，愈来愈夺得了对整个经济生活的统治权。他们往往也是私营大垄断企业、托拉斯等等的主人。要剥夺工业资本，而不把金融资本包括在内，是不可能的。这两者是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化（或直接称为向国家、地方和合作社所有制的过渡）本身，就会伴随着发生大部分金融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例如，使一个工厂或一个农场国有化，它的债务也国有化了，即从私人债务变成了国债。如果它是股份公司，则股东就成了国家的债权人。

在这个问题上，还应当对土地所有制加以探讨。我这里指的是地产，不是农业企业。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大企业，将自行经历一个与其他大企业相同的转变过程。它们将丧失雇佣劳动者，并被迫申请出卖其本身的地产给国家或地方，而完成其社会化。但小农的企业则仍将保持私有制。我将在下文再回过来谈这个问题。

因此，这里讲的不是农业企业，而是不属于企业的私人地产。这种地产，无论是城市地产或农村地产，都是以典价、租金或抵押利息的形式让其所有者取得土地收益的。

上述对金融资本家的处置办法，也同样适用于地主。他们在经济生活中也是不履行任何个人职务的，因此很容易被人撇在一边。对私人地产，正如对上面提到的私人垄断企业那样，甚至在资产阶级人士中间，今日也已经有了要求使其社会化的呼声。因为私人地产，尤其是城市中的私人地产，已成为越来越咄咄逼人和贻害无穷的了。在这方面要实现社会化，已经不需要别的什么，只需要有必要的权力就行了，而获胜的无产阶级将提供这种权力。

剥夺剥削阶级显然只是一个权力问题。它是出于无产阶级的经济需要而提出来的，也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必然成果。

3. 没收还是赎买？

我们不能象回答关于剥夺剥削阶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那样，有把握地回答一个紧接着提出来的问题：剥夺是采取赎买还是没收方式来实现？对原来的所有主是否应给以补偿？这是一个今天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负有完成这一发展使命的人。现在也还不具备可以决定必须采取哪种答案的任何条件。尽管如此，仍有一系列理由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政权将力求选择赎买的办法，选择向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支付补偿的办法。在各种理由中，我只想提及两个；在我看来，这两个理由是最主要的。上面已经讲过，金融资本已变成了失去个人权力的东西；今日可以把任何数额的金钱变成货币资本，而金钱的主人却不用亲自执行其资本家的职能。我们知道，节省下一个马克的人，可以把这个马克拿去生利，而并不就成为资本家。人所共知，现存制度的乐观维护者充分利用了这种现象。他们得出结论说，剥夺资本家的最简易途径，莫过于让一切工人把他们的全部积蓄都存入银行或购买股票，这样他们就在资本中占去了一定份额。这些乐观论者有时还借口说，

在当代我们要没收资本的话，就会不仅没收了富人的资本，而且没收了工人的资本，甚至把穷人、寡妇和孤儿的零星存款也没收了。据说，我们这样做就会在工人中间引起很大的不满，从而增加了一条煽动工人起来推翻工人自己的统治的理由；这些歌颂现存制度的先生们肯定在盼望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不需要进一步谈论前一种假定。它太荒唐可笑了。那些想用增加存款来剥夺资本的人，恰恰看不到大资本的迅速得多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普遍实行没收的话，无产阶级政权也会把普通百姓的存款都没收去，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但是工人决不会因为这个缘故而不要自己的统治（谁要满意这种假定，谁就是存心抓住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来反对社会革命）。不过，这确实是获胜的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不实行简单没收的理由所在。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可以问，无产阶级能从剥夺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它的后果只能是把一切资本都变成了货币资本，变成了国家、地方和合作社的债务；以前由资本家直接从工人身上取得的剩余价值，现在则由国家、地方和合作社从工人身上取得再交给资本家。但是这样做，工人的景况会有所改变吗？

这个问题诚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虽然无产阶级政权还把资本家原先所得的利润额给予资本家，然而在无产阶级统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剥夺毕竟能带来这样的好处：从今以后，剥削将不可能有任何进一步的增加。任何新的投资和资本的增殖，都毫无可能了；同样，也不可能在地租的增殖。单单这一点，就已经是无产阶级变革的巨大成就。从今以后，社会财富的任何进一步增殖，都将造福于整个社会。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好处。一旦全部资本家的财产都采取了国家和地方公债或合作社证券的形式，那末立即就可以把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提高到以前不可能达到的高度。诚然，

我们今日已有人要求用这种税则来代替其他一切税收，特别是代替间接税。但是，即使我们能获得实行这种税收的力量——譬如获得其他政党的支持（这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不愿意那样做），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人们都知道，税额愈高，瞒产漏税的企图就愈厉害。但是，即使有了防止任何隐瞒收入和财产的办法，仍不能把所得税和财产税任意提高。因为，如果税收额高到与收入额和财产额相差无几了，资本就会干脆向国外转移；国家就只好望洋兴叹而无办法对付。这时，国家就只空有所得税和财产税之名，而没有实际收入和财产。因此，即使已拥有了权力，在实行税收时仍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如果资本家的全部财产都变了公债或证券的形式，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今天无法确切查明的资本家的财产，到那时就了如指掌了。那时，只须规定一切证券都必须注明持有人，就能精确地知道每笔大财产和每个资本家的收入，并且也能在提高税率时不至发生瞒产漏税的事。那时也不可能用资金外逃的办法来逃避税收，因为那时是由公共机构，首先是国家来支付利息的，国家可以在支付利息之前先把税额从利息中扣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提到多高，就可以提到多高。必要时，可以提到近乎或等于对大资产实行没收的高度。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对大资产不直接没收而间接剥夺的办法有什么好处呢？先对资本按价赎买，然后又用税收立法来加以剥夺，这岂不只是为了避免剥夺得太露骨了而采取的虚饰手法吗？看来，它与直接没收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区别而已。

不，区别不是那么微小的。直接没收一切资本就会不加区别地打击一大片，包括小资本和大资本，无工作能力者和有工作能力者的资本。这种办法很难、甚至不可能在同一企业里把大资产和与它一起投入的小额货币资本区别开来。直接没收，其势迅

猛，往往是一举而完成的；通过税收来实行剥夺则使废除资本家财产的过程拉长起来，以便与新制度的日益巩固及其良好影响的日益扩大过程相适应。这个剥夺过程可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以便造就新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是在新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自然不习惯与资本和利息打交道。这样一来剥夺就不再是严酷无情的事，而是可以适应得了和不至痛心的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过程愈和平，愈组织得好，愈宣传教育得好，我们就愈能指望采取稳健的而不是原始的剥夺形式。

我在这个问题上论述得稍长一些，因为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借口之一，而不是因为我们执行起来会遇到最大的困难。毋宁说，巨大的困难要在上述一切过程之后才开始发生。在社会革命的各种重大变革中，生产资料的剥夺比较起来是最简单的过程了。它只需要有必要的权力，而且在我们整个探讨中，它只是属于那些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之一。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困难不在所有制方面，而在生产方面。

4. 吸收工人参加劳动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革命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动经济上的攻势，因为后者是阻碍着它的发展的。但是，生产必须进行，不能停顿；哪怕只停顿几个星期，就会使整个社会毁灭。因此，获胜的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要不顾一切干扰，确保生产继续进行，把那些离开工厂或其他劳动场所的工人召集回来，并使他们坚守劳动岗位，以便毫无干扰地继续进行生产。

新的政权有什么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呢？用饥饿来鞭策是肯定不行的，实行人身强制更行不通。如果有人认为无产阶级胜利

以后将实施监狱式的统治，每个人都由其上级指派工作，那末他就根本不了解无产阶级，因为这时能自己制定法律的无产阶级，怀有比破口大骂未来国家具有监狱性质的那些奴颜卑膝的迂腐教授们强烈得多的自由感。

获胜的无产阶级决不会容忍监狱式或兵营式的制度。它有其他办法来使工人继续进行劳动，因而不需要任何这种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忽视习惯的巨大力量。资本已使现代工人习惯于成天劳动；如果没有工作，就根本受不了。甚至有的人已如此习惯于劳动，以至不干活就不知道怎样消磨闲暇，无事可干对他们来说是件苦恼的事情。他们中间长期无所事事而心情愉快的人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深信，如果能使劳动失去那种过度劳累的可厌性，如果能把劳动时间压缩到合理的程度，只消劳动习惯就足以使大量工人在工厂和矿山里经常坚持劳动。

但是不言而喻，我们不能单靠这种动力，因为它是十分软弱的。一个更强大得多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纪律性**。我们知道，只要无产阶级的工会宣布罢工，有组织的工人的纪律性就强大得足以使工人们自愿承担一切失业的危险和恐慌，情愿挨上几个月的饿，也要让共同的事业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我认为，既然能用纪律的力量使工人**离开**工作岗位，那就也能用纪律的力量使工人**留在**工厂里。只要工会一经确认有坚持正常工作的必要，我深信，在整体的利益的考虑下是很少有个别工会会员擅离职守现象的。无产阶级今日作为斗争手段来扰乱生产的同一威力，到那时就成了确保社会劳动继续正常进行的有效手段。工会组织今日的发展程度愈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受干扰地继续进行生产的可能性就愈大。

但是，无产阶级养成的纪律性决不是军事纪律性。它并不意味着盲目服从上级所树立的权威。它是民主的纪律，即自愿服从自己选出的领导，服从大多数同志的决议。要在工厂里执行民主

一三
四

的纪律,就必须首先建立民主的劳动组织,以民主的工厂代替今日专制的工厂。不用说,社会主义政权从一开始就力求以民主方式来组织生产。但是,即使获胜的无产阶级起初并没有想到这样做,确保生产继续进行的必要性也会促使他们这样做。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执行工会的纪律,才能使社会劳动纪律得到可靠的保证。

当然,这不能处处都以同样方式来实现,因为各厂都有其特点,必须按照各自的特点来组织各厂的工人。譬如说,有些企业没有一套专职机构是不行的,铁路就是这样。那就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设立民主机构:工人选出代表,代表们组成一种类似议会的机构来制定劳动规章并监督专职机构的管理工作。另一些企业可以直接由工会来管理,还有一些企业可以用合作社方式来经营。因此,企业的民主机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不能指望一切企业的组织统统按照一个模式来进行。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将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国家和地方的所有制,也有合作社的所有制。除此之外,某些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也可以让它继续存在;我们在下文将讲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又讲到了,企业的组织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

但是,民主的纪律和劳动的习惯无论有多么强大的动力,也许还不足以保证全体工人继续参加生产。我们不能指望在今日的社会里,工会组织和纪律能随时约束工人阶级的多数。如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能组织起来的大概还只是工人阶级的少数成员。因此,必须为劳动寻找其他动力。这里有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可资利用的特殊动力,即**劳动的吸引力**。必须使现在成为一种负担的劳动,变成一种乐趣。这样,劳动就会成为一件愉快的事,工人就会乐于从事生产劳动。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无产阶级在开始其统治

时,至少可以从立即**缩短劳动时间**着手。除此之外,还要尽量使劳动场所更清洁卫生一些,更讨人喜欢一些,把劳动过程中令人生厌的陈规陋习尽可能废除掉。这一切无非只是现今已在全部劳动保护法中争取到的某些改进的继续而已。要使这方面有更大的进展,就必须进行建筑上和技术设备上的更新,但这不是一两天之内就能完成的事。把工厂和矿山里的劳动很快就变成非常吸引人的劳动,这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除了劳动的吸引力之外,还有一个必须发挥作用的力量,这就是**劳动工资的吸引力**。

我这里谈到劳动工资。有人会问,在新社会里还会有劳动工资吗?我们不是要废除工资劳动和货币吗?那末怎么还提到劳动工资呢?如果社会革命果真要立即废除货币的话,这些反对意见也许就是中肯的了。然而,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货币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简单的交换手段,它能在一个象现代生产过程那样复杂,而且还有千差万别的劳动分工的社会机体中,促成产品的周转并把它们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它是使每一个人能按其爱好(当然要在各自的经济力量限度内)满足其需要的手段。作为流通手段,货币仍将是必不可缺的,只要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当然,货币将丧失其某些功能,特别是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至少在国内交换方面。在这里略提一下价值问题可能不是不相宜的,因为它对弄清我以后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

再也没有比如下的见解更谬误的了:仿佛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力求使交换都是等价的。应当说,价值规律只是商品生产的社会所特有的规律。

商品生产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分工发达的情况下,各不相属的生产者都各为别人而进行生产。但是,任何生产方式,如果在生产上没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所拥有的劳动动力人数是有限的,要满足生产的需要并使生产继续下去,就得使

每个生产部门拥有适应其现有生产能力的劳动人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劳动是有计划地进行调节的，劳动力是按照一定的计划分配给各个生产部门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这种调节却是通过价值规律来进行的。每种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的费用，而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谈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于利润而发生的改变，因为它只会使争论陷入不必要的复杂化，而不会使人对这个问题获得新的认识。每个劳动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首先是各该社会里已达到的技术水平，以及在该生产部门中通常的劳动强度等等，简言之，即各个工人的平均生产力；其次是社会需要向有关生产部门所要求的产品数量；最后是社会所能使用的劳动力总数。由于自由竞争，每一产品的价格，也即用以交换这个产品所付出的货币量，便不断接近于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于是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虽然没有某一个中央机构在加以调节，每个劳动部门里生产的扩大永远也不至太远和太久地离开其现有的水平。在商品生产中盛行的无政府状态下，如果没有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就会很快陷入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而告终。

举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不妨举个尽量简单的例子。为说明社会生产的结果，我们只须举任何两种商品为例，我看就举裤子和吊裤带为例吧。

我们假定，在某一社会里，在随便某一期间内，裤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万个劳动日，吊裤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千个劳动日。这就是说，为了满足社会对裤子和吊裤带的需要，就现有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来说，这些劳动日是必要的。如果每一劳动日的产品值十马克，那末裤子的价值是十万马克，吊裤带的价值是一万马克。

如果某一个工人在生产中偏离了社会的定额，他在一个劳动日内生产了大约只有其他工人产量的一半，那末他一个劳动日产品的价格也只有其他工人一个劳动日产品价格的一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如果劳动的比例失调，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譬如说，从事吊裤带生产的劳动力超过了社会必要的劳动力，其超过部分必然是从其他行业吸引过来的；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就相应减少了，因为社会所能获得的劳动力人数是有限的。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都是从缝衣业吸引来的。于是，用于缝制裤子的实际劳动日只是八千，而不是一万，生产吊裤带的实际劳动日却是三千，而不是一千；以至吊裤带充斥市场，而人们却没有足够的裤子穿。这样，结果会怎样呢？吊裤带的价格下跌，裤子的价格上涨。生产吊裤带所用的三千个实际劳动日，只代表一千个社会必要劳动日的价值，每副吊裤带的价值就下跌到其原有价值值的三分之一。同时，价格也将下跌，大约还低于三分之一。但是，裤子的价值还照旧是由一万个社会必要劳动日决定的，不是由实际所用的八千个劳动日决定的，每条裤子的价值将是其原有价值值的四分之五。结果，吊裤带的生产就无利可图，从事该业的劳动力就会减少，而重新流入现已盈利非常多的裤子生产中。

这样，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价值规律就调节着生产。它虽不是可设想的调节生产的最好办法，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下，它是唯一可能的办法。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下，对生产的社会调节将取代价值规律。这时，靠等价交换来调节生产的必要性不复存在了，从而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对象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可以用某一种货币标志来代替金属货币。这时，可以不依赖价值而确定产品本身的价格。但是，隐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对于衡量产品价值来说，将永远保持其决定意义，而且很可能与历来的价格相联系。

既然劳动赋予了产品以价值和价格，那么劳动也必须用货币来偿付，因而就出现了工资。

尽管如此，谁要是也象费边派那样主张保留现存的工资制度，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费边派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废除工资制度，而是要使工资制度普遍化。这种说法仅仅在表面上看来是对的。实际上，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工资是与资本主义政权下的工资完全不同的。在今日，工资是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价格。归根结蒂，工资是由维持工人生活的费用来决定的；工资的上下波动，取决于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反之，在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这种情况不再存在了。工人不再被迫出卖劳动力，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它的价格不再是由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来决定的，而且也不再依赖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了。这时，最终决定工资水平高低的，将是可供工人阶级进行分配的现有产品数量的多寡。产品愈多，工资的一般水平就愈高。当然，在各个劳动部门之间，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仍将继续起一定的作用。因为毕竟不能象分配兵力那样，不征求工人本人同意就分配给各个企业。所以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想到某些工业部门去的工人太多，而其他一些企业则缺乏工人。这时就可以用下述办法来加以平衡，即把前一种企业的工资降低，而把后一种企业的工资提高，直到各部门、各企业都有适当的工人数目为止。至于整个工人阶级的一般工资水平，则不再由劳动力供求关系来决定，而由现有的产品数量来决定。这样，就不再发生由于生产过剩而造成工资普遍下降的现象了。相反地，生产得愈多，工资一般地就愈高。

于是又产生了如下的问题：要确保生产继续发展，就有必要用普遍提高工资的办法来使工人留在生产岗位上。但是，增加的工资用什么来支付，必要的产品数量又从哪里得来呢？

如果采取我们没有采纳的对新政权最方便的办法，即把全部

财产统统加以没收，把资本家的全部收入部分发给工人，那当然会一下子就把工资提得很高。我在写前面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那一章时，引用过一个统计。根据这一统计，1891年英国工人的收入总额约为七亿英镑，资本家的收入总额约为八亿英镑。我还进一步说明，在我看来，这个统计被粉饰得太乐观了。我有理由相信，它把工资算得太高，而把资本家的收入算得太低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妨就用1891年的这些数字也可以说明，如果把资本家的收入交给工人，则每人的工资都能**加倍**。但可惜，事情不能就这么简单对待。我们在剥夺资本的同时，也必须连带地把资本家的社会职能也接受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资本的积累。资本家并不把他们的全部收入统统消费掉，而要拨出一部分投回工厂，以扩大生产。无产阶级政权既要扩大生产，也必须这样做。因此，就凭这一理由，无产阶级政权即使对资本采取激进的剥夺办法，也不能把资本家原先的全部收入统统交给工人。何况资本家还必须从他们所搜刮的剩余价值中，提取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交给国家。只要国家和地方当局靠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作为唯一税收的话，资本家要付出的这一部分就会很快增加。而事实上，税收的负担是不会减轻的。因为，我在上面已指出过，单单重新安排学制一项就需要支出多么大的经费。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开支浩繁的医疗保证制度，以及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给予残废和老年退休金等等。

由此可见，即使我们索性剥夺了资本，从资本家现在的收入中也不可能剩下太多的钱来提高工资。如果我们还要给资本家一定的补偿，那就剩得更少了。因此，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就必须扩大生产，使其超过原有的规模。

社会革命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不单要**继续进行**生产，而且还要**提高**生产。获胜的无产阶级必须尽快提高生产，才能符合对新政

权提出的要求。

5. 提高生产

要迅速提高生产，有各式各样的办法；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办法今日已具有重大的意义。美国的托拉斯成功地应用了这两种办法，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使用来解决社会革命的方法问题。他们向我们指明了怎样把全部生产都集中在最完善的企业里，而让其他经营得较差的企业统统停产，就能一下子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几年前糖业托拉斯只利用了它所拥有的全部企业的四分之一，而达到的产量却相当于其全部企业原产量的总和。威士忌酒托拉斯也将其八十个大酒厂停闭六十八个，只继续经营的十二个酒厂的产量不久就超过了以前八十个酒厂的产量。无产阶级政权不妨也这样做，而且做起来更容易，因为它不会因此遭到私有制的阻碍。在企业属于私有财产的国家里，要淘汰其中经营不善的企业，只能通过自由竞争慢慢进行。即使是托拉斯，也只能取代那些亏损企业的私人所有权，把它们都合并到自己的手里。无产阶级既然要把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掉，它就能够在托拉斯只能在较小的生产领域内实行的方法，扩展到社会生产的整个领域去。但是，无产阶级在运用淘汰次等企业以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时，与今日托拉斯所使用的方法之间的区别，还不仅仅在于应用范围上的不同；它还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和用于其他目的。新政权实行这种改变，首先是为了提高工资。而托拉斯的做法是不顾工人的。它把闲置企业里的工人干脆解雇，至多也只利用他们来威胁那些就业的工人，压低他们的工资，使他们更服服贴贴。获胜的工人阶级当然不能这样做。它将把闲置企业里的工人调到正在继续经营的其他企业里去。托拉斯宁可使工人投闲置散，因为它们并

没有大规模扩大生产的打算。产品增加得愈多，产品的供应量就愈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的价格就会愈低。而托拉斯总是竭力阻止价格下降的。因此，它们宁可限制生产，而不扩大生产。托拉斯只让最佳工厂生产，仅仅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在价格不变甚至上涨的情况下增加利润，而决不是为了扩大生产。反之，无产阶级政权则是为了扩大生产，因为它所要的不是提高利润，而是提高工资。因此，无产阶级政权将尽量增加最佳工厂里的工人数目，以使用多班轮换制来提高生产。我想举一个例来说明其可能性和它对生产会发生多大的影响。这个例子中的数字当然是随便设想的，并不见得符合实际情况，但决不是毫无根据，而是个别企业已经办到了的。譬如我们以德国纺织工业为例。它目前拥有约一百万工人（1907年是1,088,280人），其中大半（1907年是597,412人）是在百人以上的工厂里干活的。现在我们首先假定，较大的、业务较广的工厂一般都是技术较完善的工厂。当然，不会普遍都是这样；一个二十人的工厂也可能在技术设备上比同行业的一个八十人的工厂好得多。但是一般说来，这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在这里就不妨这样假定吧，因为这只是一个用以说明问题的例子，不是一个要求明天就要做到这一点的建议。我们假定，百人以下的工厂是最不完善的工厂。这些工厂都关闭了，把工人都调到百人以上的工厂里去干活。这时，就可以把他们分成两班轮换劳动。如果目前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十小时，那末轮换后每班的工作时间大约可减少到八小时。这样一来，这个企业的生产时间便多了六小时，其机器的利用时间就更长得多，虽然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已减少了两小时。我们可以假定，每个工人的产量并不相应减少，因为已有许多实例说明，缩短劳动时间的优点一般至少能弥补其缺点。现在我再假定，目前在较次的工厂里，每个工人每年生产价值二千马克的产品，而大厂里工人的生产率比小厂高

出 100% (辛茨海莫所作的同类估计与此相近), 那末大厂里每个工人的产值便为四千马克。这样, 目前有五十万纺织工人在小厂里干活, 其产值为十亿马克, 另有五十万纺织工人在大厂里, 其产值为二十亿马克。结果, 这一百万工人共生产价值三十亿马克的产品。

但是如果在新政权下, 工人都是集中在百人以上的大厂里的, 因而都能生产四千马克的价值, 则一百万纺织工人所生产的价值达四十亿马克, 比以前多出十亿马克。为了比较起见, 我假定这里还照旧生产着价值。

但是, 还可以更进一步, 不仅使百人以下的小厂停产, 还使百人至二百人的中厂停产, 而把全部纺织业生产都集中到二百人以上的大厂里去。这种大厂的工人数目在 1907 年是 368,612 人, 即大约为纺织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 就必须分成三班轮换劳动, 才能使大厂里的全体工人都有活干。我们假定, 为了避免上夜班, 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减到五小时, 也即目前的一半。这时, 一个工人在大厂里也许比在小厂里多生产到四倍, 也即按照我们以上所作的随便的假定, 每年约生产八千马克。这是按照减少劳动时间并不同样减少其产量的原理来计算的, 因为休息较充分的工人比过度劳累的工人的工作效率高。所以我们可以假定, 工人在八小时里生产的产品同他们目前在十小时里生产的一样多。不过,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 劳动时间从八小时减到五小时后, 工人产品即使减少也不会高于 25%, 肯定要低于 37%, 这样假定就不会是过分乐观的了; 那末, 每个工人这时至少每年仍能生产五千马克, 也许六千马克, 全体工人合计则生产五十亿至六十亿马克。由此可见, 比起目前的产量来, 总产量加倍, 工资也能相应地加倍 (还根本不谈剥夺资本的话哩), 这还是在同时把劳动时间减少一半的情况下做到的。事实上, 在某种情况下, 工资的提高有时甚至比这

里所提供的数字多些。我们不妨假定，在我估计的目前纺织业三十亿马克全年产量中，有十亿用于支付工资，十亿用来添购原料、机器等等，十亿作为资本的利润。而在新政权下，它将生产六十亿马克，其中二十亿用于原料、机器等等，十亿用于资本家被剥夺后的补偿和充作迄今所实行的社会事业的经费。这时，还剩下三十亿马克可用于支付工资。这样，工资就能提高到三倍。而且这是不用添置任何新设备、新机器，只消停止小厂生产而把小厂工人调到大厂去就能办到的。因此，我们只需把托拉斯小规模地向我们示范的做法，大规模地去实施就行。阻碍着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只不过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罢了。

然而，这种办法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批评我们的人喜欢向我们提出异议说：似乎长远看来是不可能实行生产国有化的，因为目前的工厂数目实在太多了，要等竞争把小企业都淘汰掉，才有社会主义生产的可能性，但这毕竟还要历时很久。在德意志帝国境内，全部工业企业的总数竟有二百万左右；单单纺织企业就有十三万六千个（1895年还超过二十万），国家怎么经营得了这么多的企业呢？

当然，这项任务看来是大得可怕的，但是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实行托拉斯的方法，虽然把企业统统收归国有，但只经营较完善的大企业，则这项任务就减轻了许多。在136,000个纺织企业中，百人以上企业只有2,297个。显而易见，把纺织工业集中在这二千多个企业里，就大大减轻了社会调节生产的任务。我们假定新政权进一步把二百人以下的企业统统关闭，则更简单得多；这时，在136,000个企业中，只剩下一千个了。管理和监督这么一个数量的企业，决不会是无法办到的事。

这里又有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观点。我们的敌人以及我们队伍中的悲观论者在衡量我们的现社会是否具备了实行社会生产的

成熟条件时，总是拿我们社会随身拖累着而无法迅即摆脱的旧包袱的数量来作借口的。他们得意洋洋地一再向我提起目前还存在的大量小企业。但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成熟条件并不取决于**现存小企业**的数目，而取决于**已有大企业**的数目。没有发达的大企业，是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反之，在大企业大规模存在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就更容易集中生产，并且迅速摆脱小企业。这群诅咒社会主义的乌鸦很会用它们那不祥的聒噪宣告未来的不幸。他们固执地宣称，德意志帝国的小企业总数从1882年的2,882,768个增加到1907年的3,124,198个。但是，这种增加完全限于商业；工业部门的小企业则在减少：从1882年的2,175,857个减少到1907年的1,870,261个。在这个期间内，拥有五十名以上工人的大企业总数则从9,974个增加到32,007个；即增加到三倍以上。这一增加说明，已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如果说，小企业的绝对数没有同时减少，那只能说明，无产阶级需要甩掉的旧包袱数量还很大。在这方面，托拉斯可以给我们做不少准备工作。

在其他方面，托拉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今日的托拉斯不仅靠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而且采取多种手段厉行节约来增加其利润。社会主义生产必须更高度实行节约，包括合理使用机器、利用副产品和减少运输费用等等。还是举纺织业为例：把原料和副产物运给136,000个企业，与运给一千个企业，其所需的费用是大不相同的。企业的管理费也如此。在这136,000个企业中，最小的企业当然不需要特别的监督，可以把管理人员裁减到五人以下，让厂长也参加干活。除了这些最小的企业外，还有14,000个中等企业。这些企业所需要的管理人员，肯定比那一千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多得多。但是，托拉斯可以取消企业之间招徕顾客的竞争，因此还能节省出其他许多开支。自从托拉斯在美国出现以来，企业所雇用的外出推销员的数目减少了；最明显的是 J·W·詹

克斯在一篇论文中所引用的事例：有一个托拉斯一成立就扩大其生产规模，以至在它所属企业中雇用的非熟练工人数目增加了51%，熟练工人的数目只增加了14%，而在同一时期内，推销员人数则减少了75%。詹克斯还介绍说：根据某些托拉斯自己发表的数字，它们花在广告和招贴上的费用节省了40%到80%以上。

只要工业部门增加工资，就会最终地把目前在居间贸易中过着寄生生活的大量劳动力调动出来。这些人正在他们的小店铺里过着仅够温饱的生活，不是因为他们非守住店铺不可，而是因为这些店铺老板没有信心另谋生路，或者觉得所挣的钱不够养家糊口，还得找一个副业。

当工业中把工资提到够高的水平并且有足够大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从目前全德意志帝国在贸易、交通（除邮政和铁路外）和饮食业中就业的三百多万人中，也许就能调动出二百万人来，使他们脱离寄生状态而参加生产活动。

因此，提高工人阶级生产能力的两个方法是：取消寄生性的就业以及把企业集中到最完善的企业中去。采取了这两个办法，无产阶级政权就能立即把生产提高到足以大幅度增加工资并同时缩短劳动时间的一个高水平。每一次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都必然会增加劳动的吸引力，从而调动那些原先在服务行业中受雇佣和从事小店主等寄生活的人参加生产。工资愈高，劳动者就愈多。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把这种说法改为：劳动者愈多，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就愈少，产品也就愈丰富，工资也就愈高。这个规律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是不能成立的。在那里，提供的工人愈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就下降得愈厉害。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工资规律。

6. 再生产过程的组织

即使把以上所论述的托拉斯的两个方法应用于生产，也还没有充分利用无产阶级政权在增加生产方面可资利用的手段。生产过程要不断更替下去，要进行再生产，就需要不受干扰地不仅继续进行生产，还要继续进行周转。要不间断地继续进行生产，就不仅需要制造产品的工人，还有必须使原料、材料(煤)、必备的工具和机器、工人的食品等等的供应不致中断，使制成品也能找到销路。

周转的停顿就意味着经济危机。周转发生停顿，有时是由于同一种商品生产得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出产这种商品的工厂可以因为产品销路不好而不完全继续开工。它因为销路不好而没有钱，结果就缺乏资金去购买原材料，支付工资等等。但是，也可能由于某些商品生产太少而发生危机，譬如英国棉织业就曾发生过由于美国南北战争引起棉花大幅度减产而带来的危机。

危机是对现代化生产方式最严厉的批评。无产阶级政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危机。但是，这只有通过生产对生产和周转，以及再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才能做到。

人们总是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组织生产。但是，这一任务有一部分已由资本加以解决了，其方法是用拥有数千名工人的大企业的生产来代替许许多多独立的小企业。托拉斯甚至能组织整个工业部门的生产。但是有一个唯独无产阶级政权才能解决的任务，即有计划地调节产品的周转，调节企业与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在这里，消费者这个概念是指最广义的而言。它不仅包括个人消费，而且也包括生产性消费。譬如说，纺织工人在生产性消费中消费棉纱，而他所吃的面包，则属于个人消费。

无产阶级只有废除企业的私有制，才能实现其对产品周转的调节。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实现它，而且必须实现它，才能领导生产过程，才能使其政权存在下去。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根据对现有生产力(工人和生产资料)和现有需要的计算，来确定每个社会生产场所的生产量；它必须设法使每个劳动场所不仅获得必要的工人，而且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并把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而这种任务在现代大国里不是很难完成吗？譬如，有人设想：在德国，国家必须成为二百万生产场所的生产领导者及其产品周转的调节者，这些产品有一部分是作为生产资料彼此供应的，有一部分是作为消费资料销售给消费者的，而在消费者中，每人都有其时时改变的特殊需要。这项任务显然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否则就得按照一个简单公式自上而下地调节人们的需要；象过兵营生活那样，让每个人只分得其最低的份额，从而把现代化的文明生活降到何等低下的水平！难道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个兵营式的或监狱式的国家吗？

确实，这项任务是不简单的。它是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会给它带来许多难以对付的棘手问题。但是也不能夸大困难。

首先必须指出，这里所谈的并不是非得在一夜之间凭空建立起一套调节生产和周转的全新的体系不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体系已经有了，否则今日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问题只在于如何把迄今人们一直不自觉地、在倾轧、破产和危机的痛苦经历中靠价值规律的作用反复实践出来的无意识的体系变成有意识的体系；在这新体系中，将用预先测算各种主要因素的办法来改变那种由供求关系事后调整的局面。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既已有了虽不太完善和不太稳定的比例关系，就不必从头作起，只须使其完善和稳定就行。正如对待货币和价格那样，在这方面也应该承袭历史上的传

统作法,不宜一切推倒重来,而仅仅在某些方面加以扩大,在另一方面加以限制,使原来松弛的关系更趋紧密即可。

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那样,把生产集中于最完善的企业就能使企业的数目大大减少,因而在改变体制时,问题就简单多了。德意志帝国在1907年所有的2,086,368个企业中,只有13,250个是有百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其拥有的工人总数在一千一百万产业工人总数中占四百万人。我当然并不断言,将来只有这些大企业才开工。就未来的情况提出确切的数字,这样做是可笑的。援引以上的数字只是为了**举例说明**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不足以**确切描述**未来事物的实际情况。这里只是用两百万个工业企业与一万三千个大企业这个比例来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业企业的数目将大大减少。

除了减少企业的数目外,还有其他办法来减轻生产和周转的组织工作上的困难。

生产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为**消费**而生产以及为**生产**而生产。由于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资料的生产在今日已成为生产的最重要的方面,并且不断迅速增长。至于消费资料,则几乎没有一件是完全从一个生产者手里制造出来的,而要经过许多生产场所的手。因此,使消费品能使用的人,只是生产者长队中的最后一个。但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and 生产资料的生产各有其完全不同的性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大规模企业(如钢铁业、采矿业等等)活动的领域。这些企业今日已在卡特尔、托拉斯等企业主联合组织中高度组织起来。同时,在生产资料的购买者中间,也普遍发展起了企业主联合组织。今日在这些行业里,已不是一个企业与一个企业打交道,而主要是企业主联合组织与企业主联合组织、工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打交道了。在企业主联合组织不大发达的那些地方,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总是较少的,与它有关联的消费者也少。因为在这方面,消

费者并不是个人,而是整个企业。例如,在纺织机器制造业中,1907年有1,177个企业,共有31,072名工人,但其中却有702个企业总共只有1,364名工人,因此几乎用不着加以考虑。一百名工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五十七个,共有工人18,742名。它们的买主是136,000个纺织企业(不单是纺厂和织厂)。但在建立社会主义企业时,纺织企业的数目可能减少到几千个,甚至几百个。因此,在实现了集中生产于最完善企业之后,生产者一方还剩下五十个机器制造厂,消费者一方还剩下两千个纺织厂。于是,双方就供应机器达成协议,以便有计划地调节机器的生产,这难道不可能做到吗?

由此可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较少的情况下,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来说,这时为公开市场的生产就会减少,为定货而生产,也即有计划有调节的生产和周转就会增加。

消费资料的生产则具有另一种性质。在这方面,虽然我们也有大企业(制糖厂、酿酒厂),但还是以小企业为主。这是因为这类企业,主要应该适应顾客的个人需要,而小企业比大企业容易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企业的数目是很大的,而且也不能象对待生产资料的生产那样使它减少。它们主要是为公开市场而生产的。在消费者人数很多的情况下,要对公开市场作通盘估计,就比为生产而生产时难得多。在这个领域内,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数目较少,因此比起生产资料来,消费资料在生产和周转的组织工作上,就存在着更大的困难。

在这方面,我们还必须区分两个门类:**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波动比较小,因而比较稳定。比如,人们每天只需要同样数量的面粉、面包、肉类、蔬菜;对皮靴和换洗衣着的需求量每年也变化不大。反之,消费资料愈具有非必需的奢侈品的性质,其需求量的变动就愈大。这是因为人们虽然乐于占有奢侈品,但没有它们也过得去。因此,其消费量就更加

变幻莫测，得视情绪而定。但是，只要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情绪变化与其说来自买主个人，还不如说来自工业界。比如，大家都知道，时装的变化与其说是由于公众审美观的改变，不如说是由于生产者要使已出售的旧商品显得不适于继续使用，从而促使消费者另买新商品。因此，时髦的新商品必须与旧商品有显著的区别。这里除了现代生产方式本质上就具有的不可停滞性外，生产者的竞争欲也是时装迅速变化的主要原因。他们总是先生产出新时装，再把它强加于公众。

但是消费资料，尤其是奢侈品，在销售量上的波动，与其归因于消费者趣味的变化，还不如归因于消费者收入的变化。收入的变化只要不是个别情况，而是社会上较普遍的情况，就能明显地影响社会的消费。它的变化幅度是随着繁荣与危机的消长而波动的，是根据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即失业人数的增减而起落的。只要我们调查一下产生波动的源泉，便会发现它总是先出现于**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今日特别容易出现危机的是钢铁工业，这是众所周知而且普遍公认的了。

由此可见，繁荣与危机的消长及其引起的消费资料供求关系的重大波动，都是发生在生产资料的生产领域里的。我们又看到，这一领域的企业集中和生产组织今日已发展到最能将其生产和周转完全组织起来的程度。生产资料生产的稳定也会促成消费资料需求的稳定，因而可以不经调节消费，就能很容易地用统计方式确定消费资料的需求。

但是，在生产所引起的周转失调中，只有一种情况可能最不利于无产阶级政权，那就是**生产不足**，而不是**生产过剩**。在目前情况下，消费过剩是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因为今日最大的困难是出卖，即**销售**产品。反之，**购买**，即取得产品，通常不大令人忧虑，至少对于那些在口袋里有所需零钱的幸运儿是如此。可是在无产阶

级政权下,上述情况就倒转过来了。这时用不着担心产品的销售。因为它不是某个私人为了卖给另一个私人而生产的,而是社会为其本身的需要而生产的。只有当某些产品(不管它是供生产上消费的或个人消费的。)生产得**不够**,不敷所需时才会发生危机。反之,如果在某处或处处都生产得太多,虽然意味着劳动力的浪费,会使社会蒙受损失,但这并不妨碍生产和消费的继续。新政权主要关心的事必须是:使任何生产部门都不会生产得太少。这时,新政权当然要力求不在不必要的生产上浪费劳动力,因为任何这种浪费都意味着从其他各部门抽取了劳动力和不必要的延长劳动时间。

7.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在工业或居间贸易中,无产阶级政权都应当迅速结束那些以小规模经营为特征的落后的小企业部门。

上面刚才谈到的那些在组织周转方面的办法,也将导致尽快排除小的居间贸易。它们中的一部分可以用消费合作社来代替,一部分用市政设施来排挤。如果生产过程的主管机构不是同无数的购买者打交道,而只同少数几个组织打交道,那末它对生产过程的通盘了解和组织领导就必定容易得多。

除了居间商业之外,供地方需要的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例如面包房、牛奶场、蔬菜生产、住宅建筑等,也将交给消费合作社和地方去进行。

但是不能指望,一切私营小企业就会因此全部消失。农业上尤其不会如此。诚然,今日已变成资本主义企业的农业企业将不实行雇工制度,而变成国营的、地方的或合作社的企业。此外,许多今日的小农也将不再存在,而到工业的或农业的大企业里去当工人;这些企业将保证他们生活过得很好。但是可以假定,还有这

样的农民继续存在；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继续经营他们的小企业，或者至多还有一名也可算作家人的长工或侍女。在我们的农民有目前这种保守性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照目前的方式继续经营下去，这是十分可能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根本没有要接管这种小企业的意图。还没有哪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曾主张对这种农民予以剥夺，或者甚至没收他们的农庄。倒有很大可能是许可这些农民都仍然照他们迄今的做法继续经营下去。对于农民来说，社会主义政权是根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种农民经济甚至很可能由于新政权的存在而得到加强，因为新政权将给他们带来如下好处：取缔军国主义，减轻税收，实行自治，学校公办和把道路捐收归国有，取消贫民救济捐而由国家救济，也许还有降低抵押贷款的利率等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获胜的无产阶级有种种理由要求增加产品的数量，并认定农产品是需求量首先会增加的产品。尽管有人对贫困化增长的理论进行种种反驳，但今日还是有许多挨饿的人有待给以饭吃；单单这一事实就使我们有理由假定，由于工资的提高，将首先出现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因此，无产阶级政权应十分关心提高农民的生产，并为此目的而大力帮助农民。无产阶级政权为着最切身的利益，必须用牲畜、机器、肥料、改良土壤等办法，把农民的落后经营大大提高。它必须用这种方式来促进农产品的增长，即使对那些还没有成为合作社企业的农民企业也应如此。

但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必要象在其他方面那样，简化周转过程，即建立少数几个为经济目的而联合起来的组织，以代替许许多多彼此交换其产品的私人。国家也应当更多地向农民村镇和合作社，而不向个体农民供应牲畜、机器、肥料。向这些村镇和合作社收购产品的也不再是私营的居间商业，而应是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及地方和国营的企业（面粉厂、糖厂、酿酒厂等）。于是在这方面，

私营企业将逐渐退居到次于社会企业的地位；社会企业最终将改变农民企业本身，促使由几个农民企业组成的合作社组合或村镇组合变成社会性的大企业。农民将把他们的土地合并起来共同经营，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不再属于私人的合作社大企业经营方式是何等优越时更会如此。因为事实说明，这种方式能在支出同样劳力的情况下生产出比小企业多得多的产品，能在产品数量相同的情况下保证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农业小企业今日之所以还能维持其存在，在颇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们对其雇工的榨取比大企业还厉害。同时，农民干的活无疑比大地主的雇工所干的多得多。农民几乎从来没有空闲时间，甚至在他们片刻的空闲时间内，他们也要思索怎样改进他们的经营。对他们来说，除了他们的企业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此难于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原因之一。

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老的一代。年轻一代就感受不同了。他们强烈地渴望娱乐消遣，渴望轻松愉快，同时也渴望获得更高的文化。在农村里无法满足这种愿望，他们就流入城市，使乡村人口减少。但是如果农民看到，他们依然从事农业也能获得空闲和文化，他们就不再摆脱农业，而仅仅从小企业过渡到大企业。私有制的最后一个堡垒就会这样消失。

获胜的无产阶级是根本不考虑用暴力来促进这种发展的，其充分的理由就是它不想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因此，它决不能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强加给农民而自食其恶果。无论我们估计无产阶级有多么高的斗志和大无畏精神，它也不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这些自身就遭受过剥削的小老百姓，而应当指向大剥削者！

谈了农业之后，这里再来探讨一下工业中的小企业。它们也不宜在可预见的期间内完全加以消灭。诚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那样,凡有经营不善的企业同较完善的企业进行竞争的部门内,新政权都力求使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停办,并把它们的工人集中到经营良好的大企业里去;而且只要使工人在大企业里得到较优厚的工资,就能很容易地办到而不必使用暴力。但是总还有这样的工业部门,在那里机器敌不过手工,或者说机器干不了手工干的活。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我在查阅德意志帝国工商业统计时,却找不到任何一个还完全以小企业为主的行业。据我所知,在下列工业部门里(见下表),1895年还几乎完全以小企业为主(占企业总数的97%以上),还根本没有超过五十名工人的大企业。但是,在这些行业里,大企业也已取得了进展。

	企 业 数 目				超过五十名工人的	
	有1—5名工人者		有6—50名工人者		企 业 数 目	
	1895	1907	1895	1907	1895	1907
磨刀石制造业	77	27	2	8	—	—
小提琴制造业	1037	1257	24	21	—	1
解剖器材制造业	126	247	3	17	—	—
橡胶玩具制造业	4	2	—	—	—	1
理发业、假发制造业	60035	45853	470	537	—	2
洗衣业、擦靴业	744	665	4	15	—	—
烟囱清扫业	3860	4119	26	15	—	—
绘画业、雕刻业	5630	7303	84	195	—	4

由此可见,1895年时,小企业还简直遇不到任何竞争的行业;1895年以后,大企业就相继出现了,而且还在发展。在1895年时,也只有这些行业还主要由小企业居支配地位。

尽管如此,在某些直接供人消费的工业部门内,小企业还有其一定的前途。因为如所周知,机器只能制造大量定型的产品,而

许多顾客仍希望生产者照顾其个人的趣味和爱好。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业小企业的数目甚至有少许增加的可能。因为这有助于增进群众的幸福生活,从而使手工业产品的供销更为兴旺;工艺美术品的手工业因而可能获得新的推动力。诚然,我们不能指望,威廉·莫里斯^①向我们所描述过的未来景象会出现;在他那可爱的空想世界里,机器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机器仍将是生产过程中的统治者。它永远也不会把这个统治地位交还给手工劳动。但是,不能排除手工劳动在各艺术行业里又会增多的可能性,它也许会占领某些新的领域。然而,如果说它目前还主要作为极度贫困的产物,作为家庭工业而勉强存在,那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它将只作为昂贵的奢侈品而存在;在生活普遍幸福的情况下,它会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但是,生产过程的基础,将依然是使用机器的大企业。上述的小企业至多作为社会大企业这一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岛屿而保存着。

这些小企业本身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及其产品的销售形式。它们可以成为国营大企业或地方大企业的附属单位,从这些大企业那里得到原料和工具,并向这些大企业供应其产品;它们可以为私人顾客或为公开市场而生产等等。也可以象目前这样,一个工人可以前前后后在各种形式的企业里干活。譬如说,一位女裁缝可以一度在国营工厂里工作,随后又在家里为私人女顾客做一件衣服,后来又为另一个女顾客家里去做衣服,最后同几位女同事合办一个生产合作社,为定货或为库存而生产服装。

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各方面一样,可以有最大的多样性和变动可能性。最谬误莫过于把社会主义社会设想成一部简单而呆板

^①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英国作家和艺术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赞美古希腊及中世纪生活,号召建立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译者

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它的轮盘联动装置就只能按同一方式不断运转。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有好几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所有制，消费合作社所有制，生产合作社所有制，私人所有制；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企业形式——公办企业，联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营企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工人报酬形式——固定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原材料、机器用具等的节约提成奖，加班、超产奖；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产品周转形式——按合同批发，或向国家和地方商业网点、消费合作社以及生产者本人购买等等。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完全可能有象目前这样的经济机体的多样性的。它仅仅排除掉目前竞争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损人利己等等，同时也排除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

8. 精神生产

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所必然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就讲到这里。我们不可能再按照上文那种方式去继续探讨经济管理、国际交流、城乡关系等问题，否则就会离题太远，陷入歧途；这些问题固然都会因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极深刻的影响，而且都是不能用原来的办法来继续处理的。但是我并不考虑在这里来论述这些问题，尤其是因为我已在另处论述过我在这方面可论述的最主要方面（我在为阿特兰梯库斯的《未来国家一瞥》所写的序言〈第 19 页〉中以及我的《土地问题》一书中〈个人小家庭的未来〉一章〈第 447 页〉里论述过社会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世界贸易的态度）。我只想在这方面探讨一个有许多模糊认识的问题：**精神生产的未来。**

我们在上面只探讨了最根本的物质生产问题。在物质生产的

基础上,将建起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生产。对于现代的文明人类来说,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生产是与面包和肉类、煤和铁的继续生产同样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将使它不可能按以前的方法继续进行。用什么方式代替呢?

我在前面论述《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时已提到:现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再也不会害怕获胜的无产阶级会象古代野蛮人那样,把艺术和科学当作多余的旧货扔进破烂堆里;与此正相反,在广大的居民阶层中,恰恰是无产阶级对艺术和科学最感兴趣,甚至最为尊重的。但是在这方面,我的整个探讨确实不是要研究获胜的无产阶级想要做什么,而是要研究它按照事物的逻辑能够而且必须做什么。

那时,艺术和科学将不会缺少必要的物质资料。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正是要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办法,来最迅速地甩掉过时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的旧包袱,因为它们妨碍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而在私有制统治下,是只能随着竞争而缓慢和不彻底地加以除掉的。这样,社会财富必然会立即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水平而继续增多。

但是,光靠物质资料还保证不了艺术和科学的提高。单凭财富是不可能创造出富有活力的理想生活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是否满足得了高度发展精神生产的需要。我们的敌人常常对此提出异议。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目前精神生产的方式如何。它采取三种形式:首先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而由社会团体进行的,其次是由个体企业承担的,最后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

整个教育事业,从国民学校一直到高等学府,都属于第一种形式的精神生产。如果我们撇开为数很少的私立学校不谈,那么整个教育事业今日已完全是由社会经办的,其目的不是为了谋求利

润或其他收益。这首先是指现代的国立和地方创办的学校，也包括那些大多作为中世纪遗迹而留存下来的教会和公益事业开办的学校；后者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里最为常见。

对于精神活动，尤其是科学活动来说，社会性的教育事业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具有影响，而且在于它愈来愈支配着科学研究。学校教师，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愈来愈成为一些重要科研机构的垄断人，而今日没有这些科研机构便几乎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社会性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科学的技术已如此高度发达，以至（姑且撇开某些百万富翁不谈）只有国家才拥有建立和维持必要的科研机构所必须的财力。而社会科学的某些专业，如人种学、考古学等等，也需要设立愈来愈包罗万象而开支浩大的科研机构。同时，科学已愈来愈成为一种耗费精力和财力的职业，谁也不能靠这种职业来维持生活。如果要完全献身于这一门职业的话，就得接受国家的大力资助，否则他在选择双亲或配偶方面就应十分留神，必须遇到富有的双亲或富有的配偶才行。而要获得用于有成果的科学活动的基础知识，又需要愈来愈多的巨额费用。因此，科学就愈来愈被国家或被有产阶级所垄断。

无产阶级政权一定要设法消除这种情况给科学活动带来的一切限制。正如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在安排教育事业时，要使一切有才能的人都有可能获得凡是社会教育机构所能传授的一切知识。无产阶级政权将越来越需要大量的科学教育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它将最终用消除阶级矛盾的办法，来尽量使那些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为国家从事各种活动的科学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为自由些。只要还有阶级矛盾，对社会的看法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观点。最大的伪善或自欺之谈莫过于侈谈科学可以超脱于阶级矛盾之外而存在。科学只存在于研究人员的头脑里，他

们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不能脱离或超越于社会本身。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仍将取决于社会条件，不过那时的社会条件至少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罢了。

但是，比这种对社会条件的内心依赖性（任何研究人员都无法摆脱这种依赖性）更有害的，是研究人员中有许多人对国家政权或其他统治机构（譬如宗教机构）在行动上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迫使他们迎合统治阶级的观点，不能独立自由地从事研究，而是企图通过某种科学途径去寻找论据，以便为现存的制度进行辩护并驳难新兴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正在直接对科学起着败坏作用。只要无产阶级政权解除了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对学校的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科学就有种种原因会兴旺起来。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与教育事业有关的精神生活来说，并没有什么可害怕，却能给人以出现最美好前景的希望。

但到那时，精神产品的生产将会如何呢？

我们就在这方面先探讨一下个体生产吧。这里将主要考虑到画家和雕刻家，以及一部分作家。

正如不会使物质生产方面的私营小企业无法办下去那样，无产阶级政权同样不会使这种形式的商品生产无法进行。缝衣针和顶针箍既然不会算作无论如何必须国有化的生产资料，那么绘画笔和调色板、墨水和钢笔也同样不会。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废止，迄今在个体生产的艺术品市场上具有很大支付能力的买主将消声匿迹。这对艺术生产当然不会依然毫无影响，但也不会使其无法进行，而只改变其性质罢了。比方说绘画和雕像，它可以改变其陈列地点和所有主，想把它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因此它在艺术商品生产中是名副其实的代表形式。这种形式的艺术品最容易商品化，可以象金条那样收集和贮存起来，不管是为了赚取利润而把它们再出卖也好，或把它们当作珍品而收藏也好。在社会主

义社会里，这种以出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有可能会遇到不少的阻碍。但是，必然会有艺术生产的其他形式来代替上述的形式。无产阶级政权将异乎寻常地增加公共建筑物的数量，并力求把人民常去之处——无论是工作的、会议的、娱乐的场所——统统加以美化，使它们装饰得引人入胜。画家和雕刻家所创作的绘画和雕像将不再被投入商品周转过程，以致最后竟为了艺术家毫无所悉的目的而陈列在艺术家毫无所悉的目的地；画家和雕刻家将有计划地与建筑师协力合作，就象在艺术的全盛时期，例如伯里克里斯^①的雅典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样；艺术与艺术彼此间将互相支持和促进；艺术作品的生产是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目的，因而其效果、环境和观众将不再是偶然决定的，而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另一方面，以出售为目的而把艺术品当作商品来生产的**必要性**也不再存在了。这主要是因为已经根本没有必要再为赚钱或者为挣工资，即为了商品生产而从事精神劳动了。

我已经指出过，无产阶级政权将力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这从工资劳动者的观点来看是理所当然的。我也曾说明，为此目的，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只要停办那些不完善的劳动场所，而充分利用那些完善的企业就能**立即**做到。我们认为有可能立即使工资增加一倍，同时使劳动时间比目前缩短一半，这种假定根本不是异想天开的了。现今技术科学的先进程度，已足以保证在这方面取得迅速的进展。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日所取得的进展愈大，愈有可能使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们同时从事精神生产，特别是从事那种并不直接带来物质收益，但其本身却是一种报偿

^① 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纪元前约 490—429) 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繁荣时期的领袖，历史上把他执政的纪元前 450—430 年称为伯里克里斯时代。当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吸收了希腊最著名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为后世留下了诸如帕德伦神殿、雅典卫城正门等卓越的建筑艺术品。——译者

的最高级的精神活动。多出来的空闲时间，有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可以用于单纯的精神享受；而有才干的人们将能开展其创造性的活动。这样，就能使物质生产与艺术、文学以及科学的生产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经济上的必要性。我们已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努力使教育成为普遍的福利。但是，如果按目前的方式来普及教育，那么其结果就会很快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不适于从事任何物质生产，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基础。今日的社会分工已发展到使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几乎完全分离的地步。目前是在只有少数得天独厚或条件优越的人能够从事较高级的精神劳动的情况下进行物质生产的。而目前能够从事精神劳动的人，又没有能力或者不乐意去从事体力劳动。如果人人都受到教育，这在目前情况下就会使一切物质生产都不可能进行，因为这样就再也找不到任何愿意和能够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因此，想使较高级的文化教育成为公共的福利而又不危及社会的存在，那么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而且从经济上的必要性来说，都要求我们在学校里不仅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熟悉精神劳动，而且熟悉体力劳动，在他们身上牢固地扎下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结合的习惯的根子。

为了促进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结合，使精神生产不再受到目前不愿从物质生产的限制，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在居民群众中实行这样两种措施：一方面要不断缩短所谓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从而使从物质生产的人能腾出愈来愈多的时间去从事精神劳动，这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办到。另一方面要增加受教育者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在受教育者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必须这样做。

但很可能：在这种结合过程中，体力劳动将成为一种职业劳

动,成为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必要劳动,而精神劳动则成为一种摆脱了任何社会强制的、体现个性的自由劳动。因为比起体力劳动来,精神劳动与社会强制更不相容得多。无产阶级所实行的这种解放精神劳动的作法,并不是空想主义者虔诚的愿望,而是无产阶级胜利在经济上的必然后果。

最后,我们要探讨一下受资本主义剥削的精神生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精神生产的第三种形式。如果说,精神生产的三种形式中的第一种形式主要包括科学,第二种形式主要包括造型艺术,那末第三种形式就涉及到精神活动的各方面,但主要是作家和演员,他们的对立面是作为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出版商、报馆老板和剧院经理。

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这种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它之所以存在,是由于这种精神生产只有靠巨款购置的技术设备和大量人力的合作才能适应公众的需要。在这方面,靠某一个人独自的力量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但这岂不是说,这里可以代替资本主义企业的又只是国营企业么?如果这样的话,把精神生活中如此巨大而重要的部分交给国家集中管理,岂不是使这种精神生活必然面临它可能遇到的最恶劣的情况,面临千篇一律和停顿不前的危险么?国家政权果真不再是一个阶级的机构,但岂非成了一种多数人的机构么?能否使精神生活取决于多数派的决定呢?任何新的真理、新的观点和感受,难道最初不都是仅仅由微不足道的少数派领会出来并加以维护的吗?实行这种新办法难道不会使那些最优秀和最有头脑的文化战士与无产阶级政权处于经常对立的状态中吗?尽管无产阶级政权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但当它把人们的精神活动束缚在只有靠社会的财力才能举办的事业中时,岂不把它所提供的自由完全抵消了,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么?这里诚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决不是无法解决

的问题。

首先应该指出，在社会必需的精神生产中，也象在整个生产中一样，不仅由**国家**来提供资金并加以领导，而且可以由**地方**来进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防止任何千篇一律，防止中央政权对精神生活的任何操纵。何况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取代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企业的其他组织。这些**自由组合的社团**为艺术、科学和公共生活服务，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促进或直接从事这些领域里的生产。今日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社团在演出戏剧，发行报纸，收购艺术品，出版书刊，举办科学考察等等。物质生产的时间愈缩得短，工资愈提得高，自由组合的社团就必然会更加繁荣兴旺。它们不仅在数量上，在成员的热心程度和技术水平上必然有所增长，而且知识界的捐赠和对其共同事业的支持也必然日益增多。我预料，这种自由组合的社团将在精神生活方面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这些自由组合将取代资本去组织和领导精神生产，因为这种精神生产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统治这些领域，决不会给它们带来更大的束缚，只会给它们带来更多的自由。

把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从资本主义统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个人从繁重的单纯体力劳动负担下解放出来；用自由组合的社团来代替社会精神生产中的资本主义企业——这些就是无产阶级政权在精神生产方面的发展趋势。

我们知道，生产领域里的问题是带有矛盾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务}一方面是要把社会生产过程安排成一个有统一步调的体系，从而使个人处于固定的生产秩序中并受到其约束。另一方面，又使个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觉性，能够独立自主，不受社会的限制。人们今日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获得个性发展的自由，并且随着人与人的关系日益敏感和自私，便在待人接物方面

力求取得充分的自主权,特别是对待婚姻关系,而艺术家和思想家则更包括对待周围世界的关系。谋求社会稳定和个体解放,这就是资本主义摆在社会面前的两项历史任务。这两者看起来互相矛盾,却可能同时加以解决,因为它们各自涉及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当然,谁想用一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两个方面,谁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无政府主义就是这样失败的。无政府主义本是小资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限制和压迫的产物。习惯于按自己的心意来安排工作的小手工业者,曾起而反抗工厂的纪律和单调乏味的工作。他们的理想依然是个体劳动的自由。在已不可能从事自由劳动的情况下,他们设法代之以自由组合的社团来从事独立自主的共同劳动。

正如我们已多次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这个“新中间等级”按其社会地位来说,仅是早期小资产阶级的精华和更有自觉表现的部分而已。他们的工作态度正是把小资产阶级同样对劳动自由的渴望和对纪律与单调乏味工作的反感加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因此,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即无政府主义的。但是,尽管他们的这种理想在精神生产领域里是具有进步性的,但是在仍然受到没落的手工业生产条件限制的物质生产领域里却显然是反动的。

在现阶段生产中就生产量而言,只有两种可能存在的物质生产形式(当然还有某些残余,但大多是罕见的)其一是**共产主义的**,它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以及中央机构对生产的有计划领导为标志;另一个则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物质生产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自由组合的社团如果不进行集中的物质生产,就必须把商品生产转移到自由竞争所决定的价值规律上来,否则就会造成混乱。我们在上文已看到,在各个企业进行自由生产的情况下,价值规律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价值规律能调节各个生

产部门彼此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从而防止诸如钮扣充斥市场而又苦于面包奇缺之类不合理现象的发生。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商品生产必然继续采取某些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正如许多生产合作社所证明的那样。在物质生产方面想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这充其量是干西西富斯^①那种徒劳无功的重活儿。

精神生产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而以物质生产方面能提供多余的产品和劳动力为保证的。精神生产只有当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的时候才会繁荣起来。如果物质生活陷于混乱，那末我们的生存也就根本受到了威胁。反之，现有的多余产品和劳动力按什么比例流向自由创造精神财富的各个部门，对于我们的生存却是绝对无关紧要的；只有教育事业属于例外，而有其特殊的规律，甚至在现今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也完全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而由社会加以调节。如果大家都去从事某一种商品（比方说钮扣）的生产，而使大量的劳动力流向那里，以致没有剩下足够的劳动力去从事其他商品（比方说面包）的生产，那末社会就会陷入问题严重的情况。反之，抒情诗和悲剧、亚述学著作和植物学著作的生产比例则不是一定的，既没有最小极限，也没有最大极限；如果今天写的剧本比昨天多一倍，今天写的抒情诗却只有昨天的一半；如果今天出版了二十部亚述学著作，只出版了十部植物学著作，而昨天的比例却又正相反，则社会的兴旺发达并不因此受到丝毫的影响。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表明，尽管有种种心理价值理论，价值规律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并不同样适用精神生产领域。在精神生产领域里，对生产的集中领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简直是荒谬的；在这个领域里，完全可以盛行自由生产，而决不致于变成

^① 西西富斯(Sisyphus)是希腊神话中的柯林特王，因待人狡猾诡谲而被罚在冥府推运巨石到山顶，但巨石每次推上都重新滚下来。——译者

受价值支配的商品生产或者受大企业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

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模式。它是由无产阶级的统治,换句话讲,由社会革命按照经济事实的逻辑而发展出来的,不管无产阶级的愿望、意图和理论本来如何。

9. 无产阶级统治的心理前提

某些读者也许感到诧异:我在这里探讨时总是只谈经济条件。我并没有探讨新社会的道德基础应该是什么;它应该以康德的伦理学为依据呢,还是以边沁的伦理学为依据,即它的基本准则应该是绝对命令呢,还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我也没有探讨新社会的最高法学原则必须是什么;它必须是全部劳动收益权呢,还是生存权,或如某些法学社会主义者所揭示的其他经济基本权利之一。毫无疑问,在社会革命中,法律和道德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始终在经济方面的要求。

不过,除了**法律和道德**之外,还要探讨一下**心理学**。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难道不会从心理学上也产生一些问题,而且是意义极为重大的问题吗?比如,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首先要有不平凡的人——那些大公无私而温和善良的、热爱劳动而颇有才智的真正的天使吗?对于有自私心和残暴性的目前这一代人来说,社会革命岂不是个争夺果实和大肆破坏的信号,或者都打偷懒主意从而导致这一代人堕落沉沦的信号吗?只要人们一天没有变成高尚的人,经济基础的种种变革似乎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种腔调和这种词句都不是新的。早在一百年以前,当鼠目寸光的庸人发表议论时,就有过这种说法了。据说神圣同盟里文雅的君主本来很乐意给他的庶民们以种种可能的自由,但是这些庶

民必须先具备配享自由的“成熟性”！

我并不想否认，任何生产制度都不仅需要一定的技术前提，而且需要一定的心理前提，否则便不能奏效。某一特定生产制度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前提，是由它本身所提出的经济任务的性质决定的。

谁也不会断言，在我的论述中已经规定了人的前提是首先要有天使般的角色。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首先要有**才智、纪律和组织才能**。这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必要的心理前提，而资本主义社会今日已恰好造就了这些前提。资本的历史任务就在于使工人遵守纪律和把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精神视野超越了工厂的场地和教堂的塔尖。

在手工业企业或农民企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生产，这不仅由于这类企业生产率太低和在经济上站不住脚，而且由于心理上的原因，所以都是行不通的。我已经指出过，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何等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何等地与社会企业的纪律背道而驰。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资本所面临的重大困难之一，因为它的第一批工人毕竟是来自手工业和农民的。十八世纪英国的资本不得不对这个难题进行斗争；这个难题目前还妨碍美国南部各州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而那里由于接近重要的原料产地，对大工业的发展本是很有利的。

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身上，不仅纪律性难于培养，而且组织才能也不容易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大批的人能联合起来进行有计划的协作。在这个经济阶段，只有军队才有可能组织成大的群体。伟大的统帅也就是伟大的组织家。资本主义生产把组织大批人群的任务移植到工业中去。如所周知，资本家成了当然的头目和统帅；他手下的杰出人物就成了各部门出色的组织者。同样地，他们的雇员中有组织才能的人就特别受到资本家的器重

和优待。于是，许多有组织才能的人迅速成长起来；无产阶级政权也可以使用他们，这样是有好处的。我们不会使工厂经理和托拉斯领导人投闲置散，无所事事。

但是资本也需要有文化素养的劳动力；于是我们看到，竞争随时随地都在大大促进职业教育的改善。另一方面，交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也自然而然地增进了工人的精神视野的扩大。

但是，构成社会主义生产的心理前提的，不仅有资本家要剥削大批工人的欲望，还有无产阶级反对剥削的斗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斗争中形成了一种与资本家所强加的纪律不同的纪律，同时也发展了组织才能。因为无产阶级只有靠广大群众同心同德的通力合作，才能够在反对资本及其国家机器的斗争中自保。而组织工作则是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武器，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同时都是伟大的组织人才。无产阶级除了其经济上的必不可缺性和进行组织工作之外，就没有别的武器来对抗资本家的金钱和军事国家的枪炮了。无产阶级的文化素养也是在斗争中使用它的这两种武器而增长起来的，这不需要任何证明。

无产阶级不仅一般来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严格的纪律及其广大群众的完善的组织工作，而且在经济生活中也必须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力量击败如此可怕的敌人。我们可以肯定，无产阶级只有在高度发挥它的上述各种特长的情况下，才能克敌制胜。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和心理前提都未充分具备之前，不可能出现无产阶级的统治，因而也不可能出现社会革命。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必须人人成为天使；也不是说，我们还得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心理上的成熟。

既然现代无产阶级本身并不需要大大地改变就能使自己成熟到足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那末我们当然可以指望，社会主义社会也能大大改变人们的性格。这里就为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个先

决条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办到的,因而也根本不可能具备的先决条件,那就是造就出比现代人更高级类型的人。这将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成果**。社会主义将给人类带来安定、舒适和闲暇,将把人们的思想提高到超凡出俗的境界,因为人们已不再天天想着从哪里弄到明天吃的面包。社会主义将使各人的个性不取决于别人的个性,因而也不再有奴性和对人的鄙视。同时,也将消灭城乡差别,使人们都能享有和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并恢复人的天性,使其能从生活的力量和乐趣中得到发展。

社会主义在铲除悲观主义的心理根源的同时,也会铲除悲观主义的社会根源,从而把一些人贫穷潦倒(他们虽处境困难却有起码的情操)而另一些人脑满肠肥(他们养尊处优而纵欲行乐于灯红酒绿之中)的不合理现象消灭掉。社会主义将消除贫富不均和伤天害理,使人们乐以忘忧,赏心悦目,饱享幸福,从而保证每一个人都充分获得科学创造和艺术创作的自由。

难道我们不可以指望,在这种条件下将会造就出一代新人,而远远胜过传统文化所培养的最高超的人么?这才是超人,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但不是特殊的超人,而是一般的超人,即比他们的前辈高超,而不是比他们的同志高超的超人。他们是高尚的人,不以超群出众而自满,但以共同提高,共同幸福为己愿。因此,他们感到自己的力量不应来自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应参与志同道合者中,共同汲取战胜最大困难的勇气。

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力和美的王国将会出现;我们将不辜负我们最优秀、最崇高的思想家们的这一伟大理想。